

# 中山公論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半



時評

為旅漢各大學的同學請命  
蘇芬和平與遠東局面  
偉大的三月

(蕭偉英)  
(陳肅江)  
(哲柔)

論現階段中國工業化問題

蕭冠英

蘇聯的合作制與三民主義的合作制

劉耀榮

履畝稅之研究

周伯棣

論戰時財政上的銀行信用

李宏略

戰時公債論

嚴顯郁

論法幣的健存性

李作榮

中大動態

中國工業建設問題座談會紀錄

中國軍事史料叢刊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審查證第一九七號

# 時評

## 為旅滇各大學的同學請命

——這是戰時社會問題之一——

蕭雋英

淡白先生在本刊新年特大號裏面，曾發表了一篇「俸給生活懸崖」的文章，在那篇文章是有這樣的寫道：「物價的飛漲，形成一種災難，一般小市民及俸給生活層，每天都在發抖！我相信他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每到市場上緊張的情緒，比受「敵機空襲」還要可怕。「空襲」——還有「解除警報」的時候，可以舒一舒氣。此刻物價飛漲的「信號」，竟使你——一般小市民及俸給生活層的細胞，每一分一秒都在擺盪着。」

上面所說的話，雖僅是描寫出小市民及俸給生活層所受目前物價飛漲的痛苦情形，而藉父兄庇蔭的大學學生，老實說，也有同樣痛若之感！不，即一般勤勞終日的人民，其所受的痛苦，恐怕是比上述的情形更加厲害萬倍吧！本月一日雲南日報之社論——再論糧高漲問題，是有如左很正確地指出它的嚴重性：

「雲南糧價，自去年春季開始上漲，即成垂直線的增高，到了今年，米價飛漲，更出乎意外的騰躍，今年米價與去年同期比較，相差到五倍以上，其他雜糧亦

隨比例而增加，貧民早就痛苦異常，中等之家，一月勤勞，亦全為兩餐所需而奔忙，這種現象，自應亟加糾正。

「米價的漲落，最能反應到其他物品價格的增跌，所以昆明米價達到百元一石的期間，百物亦隨之突飛猛躍，這對於雲南大後方的經濟建設，有很大的惡影響。」

自從糧食及其他物價飛漲以來，一般人民固感生活困難，而數在九千以上之旅滇各大學的同學，則更有枵腹求學之苦！抗戰以來，教育部雖有頒發貸金及慈善團體之救濟金，但其定額微小，亦難追上目前物價飛漲之比率，在此米珠薪桂的情勢之下，若不亟加設法改善，則其對於培植健全抗建隊伍的教育，固有絕大底影響，而遺害抗建的前途，那是更不知伊於胡底的了！蔣委員長有鑒於此，特撥國幣十萬元，交山陳部長酌給改良膳食（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日報）；本省龍主席亦以政府相距咫尺，深悉各大學生之痛苦，經着省府添籌國幣五萬元交請各大學併案辦理，同時

規定二十九年度獎學金的辦法——其人數暫以五百名為限（二十九年二月八日雲南日報雲南省政府秘書處致各大學函），此固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但其關懷勤苦學生，則誠可感！

雲南省是擔負大後方抗建的使命，復興民族的根據地；龍主席深知目前物價這樣高漲，光是做到這一點，也不過如：「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澆洧」一樣，不免像孟子批評所說：「惠而不知為政」，同樣是不能解決在抗建期中嚴重的民生問題。所以，牠就擺進而從政治上求根本的解決：

「如今本人很鄭重的說，無論問題怎樣困難，有了最大的決心，必定解決這個問題，這不是單純的一個民食問題，這是與國家抗戰勝負有關的問題，本人對國家有責任，對人民有責任，對這問題必求解決。……自己亦相信儘管當前糧食問題如何困難，本人自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把握。……」（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雲南日報）

上面所講固是一針見血的老實話，同時也

可藉此知道龍主席已真切地看出目前底物價高漲，是一個戰時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若不早日解決——即各大學的同學及勞苦大眾悲慘之生活存在下去，的確是一個抗建前途底重大危機！所以，我們現在很誠懇地希望中央政府及龍主席在「抗戰高於一切」的原則之下，對當

前跳躍式的物價問題，迅速予以澈底的解決；因為唯有真正實行改善了民衆生活，纔能使牛馬式的生活着並且凍餓時虞的人民，自發地參加抗建底工作，積極的擁戴愛民若赤的政府。就戰時教育的任務來說，我們更應該爲「食飯問題」，而行將失學的九千同學——未來抗建

的戰鬥員而請命，希予立即澈底改善。在抗建步入艱苦階段的今日，我們相信賢明的當局，必能實踐其諾言；「在最近期內必有具體事實，以告慰本省人民」（龍主席語），以完成歷史所賦予它的艱巨的任務！（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 蘇芬和平與遠東局面

陳嘯江

蘇芬兩國的締和條約，已於三月十二日簽訂於莫斯科了。

國抗戰中最大的同情者，而同時亦是最有力量牽制敵人的國家；敵人不致抽動關東軍南下作戰，即是因為有此「大熊」在其北部之故。在蘇芬戰事初起時，因爲地形氣候不利於進攻及芬蘭據有堅固的曼納防禦之故，一般軍事觀察家多以爲戰事不易迅速結束，敵人並想乘此機會，向蘇聯索償還債，不料此次紅軍竟以凌厲無前的姿態，在二次總攻之下，把事件全部解決，這一方面可證明蘇聯軍力的偉大，另一方面又可表示蘇聯已有餘力注及東方，這樣，自引起敵人的煩惱了。

加美副國務卿威爾斯聘歐之行，適在此時，更易促進此事之實現。歐戰如能完結，列強便有餘暇，注到遠東，而壓迫日本結束侵略戰爭。天下從此或可暫時太平了。

這條約最重要的，是第二，第四兩條。第二條規定芬蘭以整個卡累利阿地峽暨維堡城，維堡灣，拉多加湖西岸和北岸，開赫荷姆，索達瓦拉蘇至維諾城，芬蘭灣中許多島嶼，克美佳維以東一帶地方，庫俄拉佳維城，利巴希與斯蘭得列半島一律讓與蘇聯，第四條又規定芬蘭以漢科半島及附近地帶租與蘇聯，藉爲後者建立海軍根據地並屯駐陸，空軍之用。這樣，不特所謂世界最大的勞工城市——列寧格勒，可獲得安全的保障，自芬蘭灣以迄北冰洋一帶之地，蘇聯都無被攻擊之虞。列強利用北歐小國包圍蘇聯的計劃，至此乃完全成爲泡影，而蘇聯的西北邊陲，至此亦可完全高枕無憂了。

不過時局評論家，對於此事的觀察，却沒有這樣單純，分析起來他們至少有下列四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是最樂觀的，認爲蘇芬和平是世界和平（並包遠東）之前兆。他們以爲蘇芬締約之後，蘇聯勢更可以全力支持德國，英法感覺到持久戰之無效，或願意將戰事提前結束。更

這一軍事意義的重大，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消息傳出之後，各國各站自己的利害觀點，表現不同的態度：德意表現歡迎，英國表現焦急，美國表現沉默，而最感惶恐的，却爲我們的敵人。敵人何以感覺惶恐呢？原來蘇聯是我

這裏已可略略看出蘇芬和平與遠東局面之關係。

第二種却不敢作如此過份樂觀的估計，他們以爲蘇芬戰事與英法德戰事，本是兩個不同的局面，前者的結束未必可以影響後者。不過此派却承認此事有使美蘇合作制裁暴日的可能。因爲最近的美蘇交惡，係由芬蘭之事而起，芬蘭之事既了，美蘇在遠東利益相同，自可引出相同的行動。

第三種的看法更爲謹慎。他們以爲美蘇是不同主義的國家，兩者的合作，定有相當的限度。在目前最可能的局面，還是蘇聯恢復從前強硬的態度，時時在遠東邊境與敵人發生衝突，藉以牽制敵方的兵力。張鼓峯一類的事件，或於最近將來，再度出現，也未可知。

第四種却墜入悲觀的陷阱去。他們以爲蘇聯西陲可以被襲擊的地方，除波羅的海一帶外，尚有南部的黑海一帶。芬蘭事件解決之後，

或於最近將來，再度出現，也未可知。

蘇聯或乘其戰勝餘威，來設法減輕巴爾幹方面的威脅，這樣蘇聯不特無法跳出歐洲混亂的局面，或將牽入歐戰的漩渦中，亦未可知。又那有力量顧及遠東呢？這派結論是：蘇芬的和平，當不會有影響於遠東的局面。

以上四種的說法，那一種較為精確呢？我們以為第一種和第四種，俱有神經過敏之感；依停戰從英德兩方的態度來看，第一說雖非絕不可能，總覺為時過早！而依最近蘇聯擬和

## 偉大的

三 月

哲 柔

偉大的三月到了！三月何以偉大？這不是曲為獎飾，過度推崇的稱呼，而是它的內容，它的歷史性所規定，應該獲得的榮譽。在三月裏頭，所包含重要的事件，計有「三一二」的總理逝世紀念及國民精神總動員紀念，「三一八」的北平民衆運動慘案，「三二九」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紀念，以及「三一」的朝鮮獨立運動，「三八」的婦女節，「三一八」的巴黎公社等等。前四者是我國特有的，是帶着地方性特殊性的事件；後三者則為國際的，是一般性普遍性的事件。人類誠如盧梭所說：「雖生而自由，但依然到處帶着鐵鎖」。古代奴隸農奴是如此，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及一般無產階級，亦是如此。在上述各種事件當中，人類爲求其自己的解放，爲解放其自己的鐵鎖，曾經流了不少的鮮血，這些鮮血流在三月裏頭，因此形成了三月的偉大。

孫總理有偉大的人格，完備的思想，和堅

東南諸國如義，如羅，如土進行談判的行動來看下謂蘇聯有牽入歐戰漩渦的可能，顯然更覺無稽。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二，第三兩說，尤其後者。再就最近蘇俄間發生的事實來研究，如蘇聯對於解決倭蘇邊界懸案及漁業問題所取之漠視態度，蘇聯對於中國之繼續援助，尤其日來所發生的庫頁島邊軍衝突事件，俱可作此種說法的良好證明。怪不得蘇芬和約初訂之時，敵方的日日新聞和美國的軍事當局俱作類

似的預測了。

總之，蘇芬和平有利於我國的抗戰，似爲無疑的事實，不過怎樣能從有利的「可能」，變爲有利的「現實」，從小的有利，變成大的有利，尤其重要的，能從蘇聯獨力牽制敵人的局面變成蘇美合力牽制敵人的局面，却有值得吾人的努力的地方。

國際變化是無常的，請吾人好好抓住機會，利用機會吧！

忍的革命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他不獨樹立了三民主義的系統，並將整個中華民族從重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吾人今日抗戰期間紀念總理。不專只在紀念其人格與思想，而發揮其革命精神，尤爲重要。查抗日戰爭。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繫，偶一不慎，則西晉時代「神州陸沉，百年墟墟」之慘狀，必將復見於今日。爲求抗戰勝利，爲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進行總理遺教，發揮總理的革命精神，非但需要，實且迫切。故吾人今日不獨希望政府當局能切實施行革命的三民主義，并且希望全國四萬萬七千萬同胞的心坎中都存着總理革命的精神。總理是中華民族解放偉大的導師，吾人紀念總理。不宜從消極方面，單表哀悼，應從積極方面，提倡總理革命精神。國民精神總動員，是戰時特有的現象。現代戰爭。不特取決於戰場上的武器與兵力，而尤取決於國民的經濟力與精神力。在蘆溝橋事

變發生之初，敵人以為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期間，即可結束戰事，但因我全國人民誓死抵抗，竟繼續至二年餘，使敵人優越的武器，不能發生絕對的作用，由此可見精神力量之偉大。所謂精神總動員，不獨要決心抵抗日寇，而對於自己所站的崗位，自己所負的任務，亦要切實去做，切實去行。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曾經這樣說過：「我對於很小的事情，也以最大的精精去處理」。查如果全國人民都能盡其應盡之職務，則一切事務皆能順利進行，從而社會各種建設，必能依次而完成。社會建設完成，則抗戰力量自然充足。敵人現正陷於不易拔足的泥淖中，兩年多以來，敵國內閣更換凡四次，對外政策，由德意路線轉變而爲英美路線，而對華政策，則由武力征服轉而爲以華制華。由此種種事實，可以看出敵人之焦急，并顯示其前途之黑暗。際此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一週年紀念之期，凡我國民，尤應益加渾

勵，庶幾強寇可摧，九仞之功可成。

北平民衆運動慘案，是一九二六年日軍轟擊大沽口，所引起的慘劇。日軍於是年三月十二日無故轟擊大沽，北平民衆激於義憤，於同年三月十八日開市民大會，遊行示威，并集於段祺瑞所組織的臨時政府門前請願，段執政不恤民情，令衛隊開槍掃射，民衆死亡甚衆，同時并通緝民衆運動領袖。自甲午戰爭以來，日寇無一日不欲滅亡中國，而我國民衆亦無時不謀反抗以圖自救。「三一八」事件，止其表現之一端而已。日寇不斷的侵略，而中國民衆反抗日抗日情緒亦與日俱增，此種歷史性決定了目前中國長期抗戰之政策。「三一八」的民衆，雖非直接死於日軍炮彈之下，而其原因實由日寇侵略而起。但以前是地方民衆的反日，現在則爲全民的鬥爭。目前的對日戰爭，是中日兩國過去數十年間一切支配被支配壓迫被壓迫清算之期，亦即中華民族解除一切帝國主義鐵鎖求取自由之期。在這個時候紀念十六年前的血案，吾人應以百倍的努力百倍的精神來洗雪這種歷史的仇恨，方無愧於「三一八」的犧牲者。吾人應踏着「三一八」的血跡前進！

七十二烈士之死難，造成中華民族革命勝利之基礎。他們勇敢的行動，壯烈的犧牲，一方面給滿清統治階級予莫大的打擊，他方面則提高了民族自覺的精神，使革命勝利的基礎終於底定。他們所流的鮮血灌溉成中華民族自由之花。他們是民族的先覺者，是革命的前鋒。他們之死，不獨值得我們紀念，而且要永遠

紀念。

「三一八」運動是朝鮮被日本併吞後，企圖恢復獨立第一次的運動。一九一九年獨立黨乘韓王國弱之時，利用羣衆熱烈的情緒，高呼韓國獨立萬歲，全國各地同時響應，學生到處與軍警突衝，形成一大獨立運動，後爲日軍殘殺政警所鎮壓，全國被檢舉二萬餘人。「三一八」運動，在表面看來，似與我們無關，但在實際上則不然。「三一八」以前朝鮮革命的目標，在於清除國內腐化的統治者，而「三一八」以後，它的刀鋒則轉向日本帝國主義。故「三一八」運動，是朝鮮革命的一個轉捩點，它是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解放之一環。這種由地方性變而爲國際性的事件，與我國目前抗戰，雖時與事有所不同，而其意義則一。日本是中國兩民族共同的敵人，中韓兩民族應切實合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據報章所載，朝鮮義勇隊，現正協助我國在各處戰場活動，而宣傳人員亦爲我國抗戰宣傳而努力。「三一八」運動既與我國抗戰同其本質，故我們不獨希望我們抗戰勝利，同時亦希望朝鮮民族本「三一八」運動的精神，能夠成立強固的聯合陣線，能成爲國際反帝侵略的一支巨流。

不獨在政治上社會上全被排擠，即在家庭上人格上亦無重要的地位，幾乎完全成爲男子的附屬物或玩弄品。此種事實之存在，不特爲婦女界之恥辱亦爲全人類之恥辱婦女界在男權專制之下屈辱了幾千年，自盧梭天賦人權學說出現之後，始燃起了他們自求解放的熱情。除了生理上若干不同之外，吾人承認女子與男子無所差異。吾人承認婦女絕對的平等權，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法律上，都應絕對的平等。在人類解放途上，不容單獨忽視婦女運動。吾人希望全世界的女性，接受「三八」傳統的精神，一路邁進。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法國巴黎所成立的勞動階級的政府。當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軍全部覆沒及法王拿破崙第三被廢的消息傳到巴黎之後，巴黎的民衆對於國王的無謀及國軍的脆弱，異常憤慨，於同年九月四日襲擊國會，強迫議員宣布拿破崙第三退位，結果成立了國防政府。但國防政府的政權，不是落在革命的民衆手中，而是爲資產階級的共和黨所操縱。國防政府成立之後，巴黎的民衆，原擬在捍衛祖國的條件之下，組織國民自衛軍極力協助政府抵抗普軍，但國防政府不獨拒絕民衆合理的要求，并擬借用俾斯麥的力量以壓迫民衆趕緊與俾斯麥訂立割地賠款的喪權辱國的和約。因此巴黎民衆愈加憤慨，遂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舉行大規模的暴動，擊敗了政府的軍隊，掌握巴黎的統治權，成立有名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巴黎公社的存在期間，僅爲七十二日，

至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經過一週問卷戰之後，遂爲國防政府軍所擊潰而全部瓦解。公社被陷之後，同時便開始空前的恐怖，民衆被殺者達一萬七千餘人，被捕而入獄者達四萬人。巴黎公社雖不幸短壽而終，但在它存續的期間，曾經頒布過歷史上所無的政綱，在這些政綱裏頭，不獨宣言個人的絕對自由及實施八小時的勞動制，並將土地資本分配於勞動團體，實行使教會與學校分離，廢止警察制度，完全改變了帝政時代頹廢的面影。它雖然祇有七十二日的壽命，但它在社會革命史上的意義却非常重大。因爲「它在實質上是勞動者的政府，是生產階級奪取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勞動者期望經濟的解放所新發現的政治形態」。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了政權的團體，所以它不獨對新國家的理論給與若干鞏固的基礎，同時亦爲一九一七年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有力的因素。自有財產制成立以來，第三階級與無產階級，經過幾千年間的被壓迫被榨取的生活，長期處於黑暗的獄中。十八世紀第三階級革命成功，雖然解除了他們自己的鐵鎖，但不特未將這條鐵鎖鎔毀。反而加之於無產階級的身上，加重無產階級的剝削與榨取。此種事實，使無產階級認清了他們的鐵鎖須他們自己血的奮鬥始能解除，因此造成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奔騰澎湃的無產階級自求解放的潮流。第三階級的革命已成過去，現在是輪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吾人希望世界全人類平等的解放，解放而爲自由的人類，對於偉大歷史的回憶，不能不予

以光榮之紀念。

上述各節，是直接間接有關於人類解放的事件，是人類犧牲無數頭顱無數鮮血所造成的

歷史。當此整個中華民族舉行偉大革命戰爭之時，吾人應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努力，與日寇作殊死戰，以完成人類解放之使命。

## 更正啓事

本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國際外交問題座談會紀錄，劉耀燊先生發言之一段（二五五頁第五行）：「中國革命成功與否，對蘇聯是息息相關的。我國失敗，不但會影響他的主義底更大發展，就是目前的中共也無以存在」，實與原意大相逕庭。原意實爲：「我國失敗，固非影響到蘇聯底和平外交政策，而且同時亦會影響蘇聯內部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爲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因原稿未有經原人核閱，致有此誤。爰特更正，並向劉先生致歉。

論現階段中國工業化問題

蕭冠英

(一) 中國戰時工業建設的意義及其可能性

在現今資本主義經濟時代中，一國之強弱富貧，純視其國民經濟機構之堅實，和健全與否而定，然而國民經濟機構之堅實，和健全與否，則又視其能否工業化而定。故方今之世，寧海萬邦，無不競力於工業建設之完成；尤以處此國際風雲惡劣之際，工業建設的運動，特別的是軍需工業與重工業建設的運動，更是世界各國的戰時經濟政策當前最活躍的中心工作。

中國國民經濟機構。數千年來皆停滯於農業經濟之階段，遂致在國際經濟之關係上，成爲進步的工業國家的附庸，而處於隸屬的地位；在國勢發展之形勢上，常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欺凌，而成爲侵略的對象；終乃演成目前強寇肆虐，國祚瀕危的險局。近年以來，國內有識之士；鑒於過去之失敗，與當前之趨勢，極力提倡改革國民經濟的機構，使之由農業經濟的陳腐階段，進而工業化；同時政府當局諸公，亦勵精圖治，發奮圖強，積極從事工業建設，冀能改善國度，增強國本，挽救傾危之頹勢。惟此工業建設之運動，正在創設之際，即爲倭寇侵略行爲所摧毀，自七七事變以來，沿海沿江新創工業都市，相率淪陷，一部份殘存之工業，伴隨國都西移，遷在西南後方各省，繼續作業，然已大非昔比，僅保殘喘而已。其他大部份之主要工廠，不爲倭寇所強佔，即爲倭寇所破壞。據最近經濟部調查，我國沿海沿江各重要都市，遭受倭寇破壞的工廠，損失情況明確之統計數字如下：(損失情況不明者在內)

(一) 工業各部門損失總價值的統計表 (早英文中國年鑑) (1938—39)

見附表一

工業種類	戰時損失數 (國幣圓爲單位)
棉織物.....	\$ 75,000,000
絲織物.....	9,800,000
雜物.....	3,000,000
絲織品.....	115,000,000
化學品.....	10,000,000
肥皂及皮革.....	3,000,000
橡皮及其製品.....	2,000,000
玻璃製品.....	5,000,000
印刷品.....	500,000
煙.....	3,000,000
麵粉.....	5,000,000
木材.....	1,500,000
機器.....	10,000,000
雜物, 其他.....	50,000,000
計	297,830,000

(二) 工業各部門損失價值的細分表 (見英文中國年鑑)(口附表三) (1938—39)

續附表二

工廠類別	廠數	戰時損失數 (國幣圓爲單位)
建築.....	3.....	\$ 10,273,000

機械	105	1,185,963
電機	222	54,152,951
運輸器具	17	5,263,700
鐵工廠	64	770,025
金屬工廠	15	95,570
化學	161	25,082,148
紡織廠	488	80,534,495
鐵	4	4,315,000
農產品	216	2,491,803
林產品	5	42,900
纖維，紙	12	2,842,100
陶器，磁器	40	18,201,790
其他	113	2,152,150
總計	1,465	\$23,403,568

(三)工業地區分佈的損失價值表(見英文中國年鑑)  
(1938—39)

見附表二

地方別	工廠數	戰時損失數 (國幣圓為單位)
南京	91	\$ 15,911,509
北平	97	15,873,340
天津	53	20,502,093
青島	137	10,618,980
江蘇	372	61,191,250
山東	243	23,492,212
河北	27	23,487,713
山西	71	15,157,746
河南	87	13,232,287

浙江	269	15,402,884
江西	2	2,720,885
安徽	5	1,389,111
廣東	9	16,973,558
廈門	2	1,420,009
總計	1,465	\$237,403,568

剛剛長育起來的中國工業之嫩芽，突然遭受了如上所述的打擊和破壞，自然是必使我國在各方面皆發生嚴重的影響。換句話說：初生的中國工業，遭受了這次倭寇殘酷的破壞，今後如不急謀補救建設，其影響所及，不特將使過去我國工業建設的運動，功虧一簣，國民經濟機構永久停滯於不利的農業經濟之階段；同時還使目前抗戰軍需之種種器材，以及民生之種種資料，無法自給，推演其極，必致動搖整個抗戰的局勢，使國計民生，陷於更加險惡的境地。因此之故，工業建設問題，在我們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緊急關頭，匪特應該提出討論，並且更須加緊步驟，集中力量，積極的着手建設。具體的說：在抗戰期中，從事工業建設，乃具有下列三大意義：

第一，適應抗戰的需要——誰都知道：近代的戰爭，乃是經濟的戰爭。經濟的實力，等於軍事的實力，更確切的說：工業的生產力，即等於軍事的作戰力。蓋在戰爭中所需要的一切軍需器材，皆是工業的所產物，例如近代戰爭中所利用的重要武器，首自陸戰的槍砲，砲彈，戰車等類起，次如海戰的戰艦，潛艇，水雷等物；終至空戰的飛機，飛船，炸彈等物，無一不是近代工業最尖端的生產品。所以工業發展的消長，直接的關係着戰爭中軍事之勝負。現今世界各國，為謀能抗禦強權，與作戰必勝計，羣皆起而致力於工業之發展，原因即在於此。我國工業因從來比人落後之故，遂致影響近代戰爭中所需要之各種器材，類多不能自製，必須仰自外國之購入，於是戰爭勝負之權柄，易為外人所操縱；況當敵人封鎖我國海岸，截斷交通路線之際，軍械來源告絕，戰局更受影響，眼前我國抗戰之局勢，大都類此。雖幸政府當局，事前對於軍需器材之購運，周詳盡至，有備無虞。但長



此下去，外則受歐戰之牽掣，內則遭敵寇之封鎖，我國抗戰軍實，難望有大量的輸入，勢非自圖產給之方策不可。故吾人爲謀抗戰勝利計，當前之要圖，厥爲積極建設工業，大則製造鎗砲，飛機，戰車等鋼鐵工業，中則製造彈藥，炸藥，醫藥等化學工業，小則製造軍服，軍糧，以及日用品之輕工業，悉應以最大努力，從速創設，俾能適應抗戰之需要，然後始可使我國強大之抗戰實力發揮盡致，而不受牽制。不過，吾人如欲使工業建設，確能充分的適應抗戰之需要，則非局部的創辦工廠，或點綴的，試辦實業，所能爲功。須將國民經濟機構，由農業重心，轉變爲工業重心；即國家之經濟政策，應側重於工業方面，使整個的國民經濟機構工業化，始能奏效。

第二，滿足民生的要求——自產業革命以還，工業經濟即代替農業而爲國民經濟的主體，國民生計之良惡，皆視工業發展的如何而定。國民日常大部份之用品，必賴工業生產增加而後能豐富，國民生計大部份之收入，必賴工業維持之。工業愈發展，則生活用品之數量必愈多，生活用品之品質必愈精；工業愈普及，則國民就職之比率必愈大，國民俸給之水準必愈高。是以爲謀解決國民生活問題，滿足國民生計要求；建設工業，亦爲急要之圖。一國之工業如不發達，不僅成千成萬流離失所窮困不堪的農村過剩人口無法消納，而滿載滿擔的外貨源源輸入，亦足使資金枯竭，民生凋敝。中國長年的慢性經濟恐慌之病根，即種伏於此。抗戰軍興，東南各省，因遭敵蹂躪蹂躪，人民咸向西北移動，西北各省乃成爲龐大的難民逃集之場所。然西北各省，建設業稱落後，農業既不能收容繁夥之難民，工業復不能供給大眾之需用。於是在西北大後方的經濟社會中，出現一種畸形而危險之病態。一方面無數之失業難民，饑寒交迫，謀生無所；他方面必需之生活用品，供不應求，價格飛漲。國民生計問題中之二大要素的就職問題，與生產問題，亦即是收入問題與物價問題，成爲不相調和，背道而馳的對立之兩極。此種病態，苟不急事解救，惡化之極，必至擾亂後方秩序，動搖抗戰基礎。解救之方，實以積極建設工業，較爲有效。蓋工業創興，一則可以吸收失業人口，二則可以供給日常用品，三

則可以開發後方資源，四則可以增加抗戰之需求。就職人口衆多，則貧乏可減；生活用品充裕，則物價可平；蘊藏資源開發，則國富可增；抗戰需要滿足，則勝利可獲。由此可知建設工業，實爲抗戰過程中，解決民生問題，滿足民生要求，最重要之急務。

第三，完成建國的使命——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之使命，誠如蔣委員長所昭示：「一面爭取抗戰勝利，一面建設新興國度」。故目前我們國策的運行，乃集中於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之二大目標之下。然則，我們從事建國，畢竟應該建設一若何國度之新國家呢？關於我國建國之指導原則，孫總理在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中，曾有具體之主張提出，值得我們崇奉與遵循。即是在國家地位上，必須完成民族主義革命，造成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政治體制上，必須實現民權主義革命，造成自由，民主的國家；在經濟機構上，必須力行民生主義革命，形成平等富強的國家。現試單就實行民生主義革命，建設平等富強的新國家問題而論，斯項目的之達到，在農業方面，則必須平均地權，發展大同主義的集體生產，使耕者有其田而增其生產；在工業方面，則必須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使實業各部門皆能集中化而高度化。簡而言之：孫總理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在經濟方面，則以發展工業，使工業電氣化，與其他各部門使之工業生產化，爲中心標的。在目前抗戰過程中，我們從事新國度之建設，自然亦必以孫總理所倡導者爲標準。二十六年神聖抗戰發動時，政府當局所宣示的抗戰建國綱領，即以此爲準則。所以現今吾人提倡工業建設，實爲完成建國使命的必然程序。只有工業建設成功，始能將陳朽的農業重心之國民經濟機構改革，從新創建一工業中心之近代式的新經濟體制的國家，從而始可使我國歷史道程，進入於前進而高級的新階段。斯種意義，乃爲工業建設運動最重要的歷史任務。

總上所述，可知工業建設，在現階段中，其需要至爲急切，其意義至爲重大。不過，至今尚有一小部份人，對於工業建設之必要性雖表贊同，但對於可能性，則持異議。認爲在現今抗戰時期中，一則由沿海沿江各工業城市，破壞過鉅，後方建設工業，無此餘力；二則抗

戰過程中，凡百軍事第一，建設工業，緩急混淆，無暇及此；三則西北後方工業資源有限，不適宜工業發展，條件不夠。斯種否定理論，乍見似屬有理，然細察之，則極錯誤。根據鄙見，則認為中國現今從事工業建設，其可能性有四：

(一) 帝國主義的資本勢力不易侵入——基於神聖抗戰的爆發，暴敵的砲火，雖然摧毀了沿海沿江各地民族工業的幼苗，但同時暴敵抑壓我民族工業發展之護符的不平等條約，却喪失其束縛的效能，既不能在我大後方設廠製造，更不能在西北各省推銷仇貨，即如第三國家的貨物，亦因海口封鎖而輸入困難，從此我民族工業，正可自由發展，無所拘束，不受自由競爭之壓迫，建設前途，較前暢適而有利，此即目前建設工業的可能性之一。

(二) 本國生產品可獨占本國市場——我國工業過去不能發展之一重大原因，即為國內市場之不能維持與擴張。蓋自西歐資本主義勢力東漸後，各種工業品源源輸入，國人多喜其質良價廉，爭相購用，國貨產品，不能競爭，漸遭排擠，於是國內市場遂為外國工業品所壟奪，國貨銷路滯塞，維持困難。抗戰軍興後，仇貨後方輸入，固已絕跡，其他洋貨之輸入，亦大受限制，有些為入口條例所不許，有些則為外匯漲價所困阻，一般商品市場，純為國貨所獨佔，甚至因為供不應求，價格飛漲，利益百倍，市場問題，全改舊觀，眼前之基礎固甚堅實，而未來之發展亦屬無窮，此即建設工業的可能性之二。

(三) 游資充集——自沿海沿江各工業都市淪陷後，民族資本，不但喪失投資的對象，且因敵寇騷擾，安住不得，相率逃避後方，及香港等安全地帶，聚集成莫大數量的游資。據去年十二月中旬昆明中央日報載，國人在香港之存款，為數甚巨，一萬萬元以上者，計有三千人，一千萬元以上者計有五十人，一百萬元以上者計有五百人，合計共十一萬萬元港幣。如以港幣一元值國幣三元之比率伸算，則值國幣三十三萬萬元。游資數量之巨，可以想見。現今此等鉅額游資，因無適當良好之投資目標，遂致轉向於土地購買，外幣儲藏，外匯投機等不正之途；殊堪嘆惜，現今政府正設法獎勵，力事保證，俾其能利用

於工業建設，與資源開發等有利正軌。果爾，則大量游資流注後方，建設資金充裕，工業建設的可能性有三了。

(四) 蘊藏豐富——西南與西北後方各地的蘊藏資源，尚屬與西北之處女地相比擬。即以動力資源而論，川、滇、黔、桂、湘五省蘊藏數量，大可驚人，估計煤動力蘊藏量有六，八八六，二二九，七六〇，〇〇〇基羅瓦特；石油動力蘊藏量計有二〇三，六九六，二五〇，〇〇〇基羅瓦特；(石油產量最富的陝、甘除外)水力蘊藏量計有九一，〇一四，二〇〇，〇〇〇基羅瓦特。(參考穆藕初著「敬告企業家書」)單就西南四省煤之蘊藏量，亦有如下之數字：

西南四省煤炭蘊藏量(單位百萬噸)

四川	九，八七四
雲南	一，六二七
貴州	一，五四九
廣西	三〇〇
合計	一三，三五〇

(參考劉階平著「西南新工業的建設」)

至於石油之蘊藏，西起新疆北部，沿天山北麓，至甘肅之玉門，敦煌，西達陝北，綿亙於洛河，延河，與無定河流域，而以膚施，延長，延川為中心，北達葭縣，米脂，南至宜君，同官，西抵膚施，車臨，黃河，形成中國最大之石油產地，南循秦嶺山脈，以達四川盆地，成為自流井，資中等縣之石油區。藏量之富，據調查估計，陝西一省，可供世界三百年之用，能與美俄二國鼎足而三，為世界三大石油產地。(見胡博淵著「中國燃料工業之自給計劃」)

最後鐵的蘊藏量，向乏精確的調查，遂有人以為西北與西南地帶缺乏鐵礦，此殊不確。最近地質調查結果，始悉大後方各地，鐵礦皆蘊藏未開發，單就四川一省初步調查，即測知其蘊藏量約一四七，五九七，七〇〇噸，其他更屬不少。

## （二）中國戰時工業建設的程序

工業建設的意義及其可能性，上面已說過，然中國工業建設，畢竟應循若何程序始可施行呢？關於此問題，歷來中外人士，議論百出，紛爭不已。昔則有重工與重農之論戰，今則有民生與國防之爭議，繼續有重工業與輕工業之辯論，更有發動機工業與器材工業之駁斥，各執一端，聚訟莫解。在現階段中，我們如欲了解中國工業建設之程序，究竟若何而始正確則必須先事確證而把握下述三大前提，庶不謬誤。

第一前提——中國自古即以農立國，農業經濟至今尚為整個國民經濟之基礎，農業之盛衰，關係最大多數國民之生計，與最廣面積土地之生產，因此我們在目前國勢瀕危與國力凋瘵的時候，努力建設工業，而使國民經濟機構工業化，則新項根本改造的大手術之施行，不獨應細心注意與顧慮國祚命脈的農業之存在無傷，斷不能做法西歐各國之犧牲農業以完成工業化的故習，戕害之氣過甚，必將鑄成礎潰梁摧的大錯；應使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一方面依然存在而發展，他方面相應工業演進而農業亦演變為工業之一部門，即是農業須適應工業發展，工業須扶植農業改進，使農業生產亦機械化，農業機構亦工業化，農業純粹為工業的原料生產之一部門，然後始能暢行無礙，功鉅弊鮮。

第二前提——方今正屬抗戰酣烈，最後勝利即將屬我之緊急時期，凡百措施，匪特軍事第一，餘為次要，尤須將所有一切配合軍事，隸屬抗戰，更為要圖。建設工業，各部門之配置關係，亦當以此為基本原則。即戰時工業之建設，不特應集中力量傾重於直接的軍需工業各部門之創設，甚而應盡可能努力於間接的民生工業各部門之改組，使之轉變為軍需部門之體制，適應抗戰需要，生產軍需用品。本來在工業體制上嚴格言之「軍需部門與民生部門之區別，至不分明。若干部門，平時本為民生用品之生產，戰時則為軍需用品之生產，例如重工業之鋼鐵製造部門，平時製造鋼板，鐵軌，戰時則造鎗砲，鐵彈

；又如發動機工業之汽車製造部門，平時製造汽車，戰時則造飛機，戰車；再如化學工業之硫酸部門，平時本造肥料，染肥，戰時則造炸藥，毒氣；即如紡織工業棉紗部門，平時乃造日用布類，戰時則成軍服工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準此理由，故我國目前對於戰時工業之建設，與乎固執於軍需部門與民生部門之界限分割，執棄孰取，毋寧着重於二者之改變體制，符合抗戰需要，較為妥當。即凡屬抗戰所急需者，雖現今之體制為民生部門，亦應立予改編，使成為軍需部門，從而建設擴張之；凡非抗戰所急需者，雖其組織形式為軍需部門，亦應立予改革，使成為真正切合抗戰需要的名實相符之軍需部門，否則予以廢止，雖變為民生部門亦不可，以免資源，財力，人力之浪費。如斯，符合抗戰急需，從而建設與編配工業各部門之原則，誠為至急至要之舉。

第三前提——正因為過去我國工業極度落後，當前抗戰需要異常迫切之故，今日我們着手戰時工業之建設，必須一本迎頭趕上之精神，以最敏捷之方式，最簡便之手續，最短小之過程，立起直追，俾得擠入於最尖端的工業國之地位，而不能因循遲延，迂迴曲折，作人尾閘，居人之後。是故我國在工業建設過程中，既不能重倡先繁榮農業，而後發展工業之陳調；更不能再踏先經過輕工業，而後進入重工業之迂道；復不能迴繞先着手器材工業，而後完成發動機工業之圈曲；且不能高調先注重民生工業，而後擴張國防工業之幻想。此等弊端，務須矯正，工業建設，庶幾切實而效宏。

明乎上述三大前提，則我國戰時工業建設程序問題，可以迎刃而解，正因為是這個理由，我對此問題的意見，認為必須區劃為三方面，而各異其步驟。

（一）在工業組織本身方面的步驟——第一，必須以動力工業與機械製造工業（簡稱機製工業）為最首要的建設程序。因為動力工業，乃是供給全數工業之發動力的主動部門，必須此一部門建設完備，其餘各部門始能獲得活動的 Energy，同時始能實現效能鉅而費用廉的經濟生產之原則。在動力工業全部部門中，尤以電力工業為最新和與

最高級之動力部門，一般大量動力與精密動力之使用者，多為電力工業是賴，是以今日世界工業進步的諸國，皆以電力化，或電氣化，為發展動力工業之最高理想。我國西南各省，水電條件至良，電力前途，未可推量，無論從工業建設之地理關係而言，與乎從動力工業之時代趨勢而言，積極的建設電力工業，皆屬必要。依據經濟部調查，西南各主要電力系統，一旦建設完成，即泯江電力系統，巫峽電力系統，鬱江電力系統建設完成，電力供給量可達三千萬匹馬力（參考顧毓琇著『中國動力工業之自給計劃』）除可使西南全體工業電力化之外，尚可使一部份農業生產亦電氣化。至是則中國工業各部門皆可因電力機關之高度的電力化，從而亦可使作業機關亦必相應而精巧化，優良化，即可使整個的工業機構高度化，是故首先的建設電力工業，不特可以充分的供給全體工業各部門作業之動力，甚至可以運用動力機關之主動地位，易於促進各部門之改良與發展。特別的發展電力工業，功效尤鉅。

至於機製工業，乃因其為製造各部門之生產工具的機器之部門，故在工業中乃居於指導的地位，凡從事工業建設者，無不重視此一部門之發展。蓋機製工業部門發達，則可供給其餘各部門所需要之種種機器，機製工業之水準愈高，則其所製造之機器必愈精，所應用之技術必愈巧，所生產之效能必愈鉅。進步的工業諸國，無不競事發展機製工業，俾其所必需之機器，自給自用，不事他求，惟有一般落後國家，機製工業至不進步，些小機器，賴人供給，遂無法與人競爭，而易為人所控制。機器工業發達，其他工業必相應而發達，機製工業進步，其他工業必相隨而進步。世人多目機製部門為整個工業興替之指標，即此之故。中國機製工業不備至甚，各種機械，類多不能自製，仰賴他國之供給，精良者購求無術，陳朽者絡繹輸入，宜乎工業發展遲鈍，難與人爭。為今之計，必須一變舊法，先從機製工業加緊建設。製造生產工具之機構完備，焉慮一般貨品之生產不能？尤以此抗戰時期中，與乎仰賴他人輸入製成品以供戰爭需要，事事受制，處處受累，不若輸入機製工具，自製機器，自產貨品，事事自主，處處自

由之為愈。由先建設機製工業，以達工業化之目的，途捷時省，力小功倍。

落後國家之建設工業，採取先由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入手，終能於最短期間，達成全般工業化之目的，甚而後來居上，青出於藍者，先例具在。遠則有德國之於機製工業；意大利之於電力工業；近則為蘇聯之於機製工業與電力工業皆能於短暫時間中，以迎頭趕上之方式，凌駕進步之國家。最堪注意的，則為蘇聯工業化之能有今日的成功，一部份原因，即由於其能採取先發展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之程序，能分別輕重緩急之關係，故能於十五年間，實施三次五年建設計劃，獲得驚人成績，足以英、德、美、法諸國經歷數百年建設之成果相媲美，或且超而過之。現代之中國建設工業，理應取法成功之蘇聯，不可模仿舊套之英法，則勝利之果，當必立至，而不致我國經濟機構及發展之動向有被犧牲之虞。

第二，則必須以器材工業為建設的次要程序。器材工業因其為工業原料器材製造與改造之初級工業部門，技術水準，組織機構，皆較單純，着手建設，比較容易。但其本質乃非工業之中心部門，縱使發展，對於一國國民經濟之工業化，無何重大之作用，至多不過便宜機製工業之發達而已，故在工業建設程序中，終不能佔主要之地位，僅居次要，為機製工業之附庸部門。中國今後建設工業，對此部門，亦應將其列於次要的程序之中，斷不可超越機製工業而居先著重之。

第三，一般低級的日用品之製造工業，就中以輕工業的紡織工業為主，雖與國民生活直接相關，頗屬重要，然對於工業化的作用，亦如器材工業，效能微渺。倘如視之為與民生息息相關，不可缺少，必須設置則不可；但如以之為工業主體，藉其發展，而欲改建經濟機構，則大荒謬。此一部門在建設程序中，亦應列於從屬之地位。此類工業，在我國素稱發達，成為中國民族工業之中心部門，因此之故，構成我國工業機構畸形發展之一因素。惟在今後工業建設之程序中，務須糾正此弊；不然，則中國工業，行將永滯於輕工業與零細工業之領域，長受重工業與機製工業國家的支配，終至淪沒於殖民地之權

境而後已。

(二) 國民經濟機構方面的步驟——凡經濟落後之農業國家從事工業建設，最關緊要而急需解決的問題，即爲如何使國民經濟機構由農業階段過渡至工業的領域？進步的諸國，過渡程序，概有三種：一爲英吉利之程序。此種程序犧牲農業，完全不顧農業之存在與發展，爲着工業化之施行，縱致摧毀農業亦不惜，由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風行一時之圈地運動（或稱圍牆運動），即爲此種程序之典型。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大率皆係如此，所差僅程度輕重之分而已。此種程序，因其犧牲農業，對農民損失至鉅，常易惹發農村騷動；近世新興之工業國，多避趨此途。二爲土耳其之程序。此種程序，在維持農業之獨立地位，與工業對衝，工業發展之一切作用，僅影響於工業過程，而不及於農業，不僅工業不能支配農業，甚至工業反須依從於農業，工業活動無非爲農產品改良品質，與增加價值而已。第一次歐戰後，土耳其之建設工業傾重於毛織原料之製造與精造，使羊毛輸出便利，價值增大，用以維持牧畜業之興隆，工業建設變爲繁榮農村之手段。如斯，則工業化始終不能澈底實行，國民經濟機構永續於農業之領域，易爲強力的工業國所乘，淪夷爲經濟的殖民地。通常國家之建設工業，亦鮮有採循此程序。三爲蘇聯之程序。此種程序，雖不犧牲農業之存在，但必須將農業置於工業支配之下，使之成爲工業的特殊部門，即使農業完全成爲生產食糧與原料之工場，農業生產方式純粹工業化與機械化，農業成爲對於工業供給原料品之器材工業部門，工業成爲對於農業供給動力與機器之動力與機製工業部門，至是，工業完全統一農業，工業化之目的完全達到。蘇聯在三次五年建設計劃運動中，由機製工業部門，製造無數農業牽引機，犁鋤機，收穫機。由電力工業部門與燃料工業部門，供給各種動力，一方面使農業工業化，同時他方面則使工業自身亦高度化，二者皆得其利。如斯之運用建設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而使國民經濟機構由農業過渡於工業，由低級工業進入於高級工業的方式，誠爲合理而有效之妥善方策。我國工業建設，亦應以蘇聯爲模範。蓋我國農業從來即爲國民

經濟之命脈，不能輕易犧牲破壞，必須維持而增進其發展，但決不能因此而強以之永續的作爲國民經濟之重心，陷國家民族於種種不利之困境，必須由農業而過渡於工業，此種早解，已爲中外人士一致的定論，惟其程序，既不能採取英吉利的自殺政策，更不應仿法土耳其的後退方式，只有模仿蘇聯，率先在工業過程中確立建設動力工業（以電力工業爲主），與機製工業之程序，益以農業機械化相表裏。工業過程中之動力與機製工業建設成功，則農業機械化始能暢行，農業機械化一旦展開，則動力與機製工業始能發達，二者交互作用，並道偕行，中國國民經濟機構，自然必於迅速而和平之過程中，由農業過渡至工業了。

(三) 抗戰過程方面的步驟——從抗戰關係而言，誰都知道，中國建設工業，應以軍需工業，國防工業爲第一位。然所謂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就需要而論，二者皆爲抗戰所需要，且在廣義國防意義中二者皆可同視爲一極難區分。因此我們如欲區別一切國防工業之緩急輕重，便於建設，惟有根據下舉二大標準，合則首先建設，違則緩延籌辦。其標準爲何？一則必須對於抗戰軍事活動具有密切的關係；二則必須對於其他各國國防工業具有決定的意義。以第一點而言，即是如果缺乏某一工業部門，則抗戰軍事活動，直接遭受打擊或妨礙勝利之獲得，例如兵工廠是；從第二點而言，如果缺乏某一工業部門，則其他國防工業部門，將必隨之而停止，不能作業，例如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是。此二大標準，完全具備者，厥爲兵工業之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但兵工業之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之發展，則又以一般的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之發展爲前提。因是建設國防工業之程序，亦應以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爲第一義，器材工業爲第二義，其餘爲次要之次要。

總而言之，中國戰時工業建設之程序，第一步應首先傾重動力工業與機製工業之建設，以此爲軸心，推動整個工業部門之發展，與國民經濟機構之工業化，然後更輔以農業機械化，與工業國防化二運動爲施行之車輪，使農業成爲工業之一部，工業適應抗戰之需要，二者相輔並進，則中國新工業建設成功之歷史道程，自必達到矣。

### (三) 中國戰時工業建設的政策

爲謀戰時工業建設之目的能早日達到，與建設工作能暢適推行計，勢不能不樹立一指導政策，以資遵循。我國戰時工業建設之政策，必須具備下列諸項基本原則：

(一) 抗戰第一義與民生國防化——我國目前之所以必須急謀建設工業者，最重要的原因，卽爲適應抗戰需要，將工業作爲抗戰軍事的經濟基礎，使抗戰軍事活動得工業之有力支持，愈可發揮最大之效能，收獲最後之勝利。所以工業建設之標的，應以抗戰爲第一義，一切措施，皆應集中於抗戰軍事活動之周圍，從而工業政策指導之方針，亦應在此抗戰第一義之原則下，不獨必須傾重於軍需工業之發展，並且還須努力於民生部門之國防化。卽是必須將一切工業部門，皆編配於抗戰需要之中，使之直接的與間接的通盤成爲國防工業之一部份，形成國民經濟之總體的戰時體制。一般所謂之民生部門，既不應與國防部門對立，更必須隸屬於國防部門。違乎抗戰國防之使命，而別存營私自利，脫離全民總員陣線之企圖，以及浪費累贅，無抗戰價值者，悉非當前我國之需要，務須摺斥，禁止建設。

(二) 主要部門着重國防與次要部門獎勵民營——在整個工業機構國防化的過程中爲謀各單位皆能配合抗戰需要執行抗戰政策計，經營與操作的主體，應以國家經理爲最妥善。特別的關於兵器工業，動力工業，機製工業，交通工業等大規模之事業，更應以國營爲適宜。其他日常用品之零細作業的部門，與器材改造部門等，則應獎勵民營，以輕國家之負擔，以收公私合作之功效。惟此等民營部門，必須在抗戰第一之前提下，接受國家之監督，遵奉抗戰之國策，至爲必要。

(三) 實行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爲求抗戰需要充分滿足，國防計劃圓滿實現，工作步調整齊一致，工業建設應實行統制政策與計劃政策，已成爲不容疑議的當然策略。在統制經濟政策之下，全國工業，無分公私，悉由政府一體統籌而編配，形成單元的整體，所有措施與活動，皆在預定的精密計劃之程序中，按照步驟，各就其能，各

作其業，逐一完成，既可避免秩序紊亂，彼此抵觸，力量分散，效果減低之弊端，更可收獲協力分工，效能特大，成算在握，結果確實之利益，且可藉此而訓練全體國民從事集體勞動，集體生產。與集體生活之習慣，增強人民「天下爲公，大同世界」之觀念，一舉兼收數利。今日新興之國家，多致力於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之推行，成效昭著。尤以戰爭時期，此種策略，殆爲舉世公奉之定則，我們勢不能例外，宜應加緊推行之。

(四) 努力機能集中與單位分化——工業經濟高度化之原則，卽爲機能集中，與單位分化。蓋工業之機構，原爲秩序整嚴，系統分明之機能的組織，故必須有一集中之中樞機關，總攬全局。此中樞機關之機能愈加集中，則各單位之動作愈可整齊而敏捷，同時工業系統愈複雜，工業範圍愈擴大，則中樞機關之機能愈必需集中，作業效能始可積極增高，但相反的各單位則須愈趨分化，始能愈加實現分業之功效。工業機構之組織始能益事精巧而週密。我國在此抗戰時期中從事工業之建設，如就工業全般的整體而言，必須將各部門活動作業之機能，力求集中，則易實施抗戰政策，管理方便，效能高遠；如就工業個別的單位而言，亦須使該部門的中樞組織，積極強大，始能健全組織，整齊步驟，發揮最大的生產效能。然則機能集中之方式爲何？簡而言之，乃爲組織之一元化，與管理之統一化。至於地域之集中，設備之集中，尙爲其次要之舉。在可能範圍內，能實現地域與設備之集中，固然對於作業效能，方便有利，縱或不可能而必須地域分散，與設備分散，只須中樞機關之機能健全，仍能收致集中之功效。況在目前正當敵機肆意轟炸破壞之際，從事地域與設備之分散，尙可減少轟炸目標，避免損失。不過，同一組織內的各單位之地域與設備的分散，乃有其最小之限度，而以不妨礙作業之隔絕與機能之分離爲前提。至於各作業單位，中國今後須力倡高度而精密的分業化，始能改良工業技術，提高生產水準。

(五) 提倡大工業的發展與策動小工業的集中——大工業發展而制，小工業凋敝而凌夷，此乃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道程，同時亦是

大工業比較小工業優越的成果。我國從事工業之建設，自然不能背反歷史的趨勢，必須提倡大工業之發展，兼以抗戰之非常需要，更非建設大工業則不能與之相適應。惟是對於小工業之排斥傾向，則須有一合理而有效之補救方案，以挽救中小工業之沒落，堅強統一陣線之基礎。斯種補救方案，則為策動中小工業之集中與合作運動。蘇聯曾以此種方案，扶掖中小農民，成功為今日之合作農業與集體農業的運動。意大利曾以此種方案，救濟中小工商業，造成今日法西斯的經濟體制之基礎。二者皆足為我國工業建設過程中解決小工業問題之借鏡。

(六) 調整都市工業與鄉村工業之關係——從來都市工業與鄉村工業，常立於對立之地位，甚而都市工業常為鄉村工業之擠擠人，鄉村工業成爲都市工業之障礙物，二者互相衝突，不相融洽，有背工業全體系協調之正義，尤當我國抗戰時期，沿海沿江都市工業大部摧毀，後方僅存之都市工業，不能滿足抗戰之要求，有賴於鄉村工業補助之處至多；加以都市工業之若干部門與單位，因爲避免敵機轟炸，分散四鄉，零細作業，嚴然鄉村工業之變型，是以益加不能使都市工業與鄉村工業長立於對立之狀態，必須急事調整。調整的方案，即建立都市工業之支配地位，與鄉村工業之隸屬關係。即以都市爲主要與支配

工業發展之領域，在其周圍之四鄉，發展其所需要之補助工業，例如原料品生產部門，原料品改造部門，以及既成品之零細修繕與裝理部門等是。如斯，則都市工業爲主體，鄉村工業爲補助，互相分工協作，不相獨立衝突，彼此皆可存在而發展，建設成效，更臻完善。

(七) 勵行工業合作運動——工業合作運動，不但爲挽救中小工業頹勢，推行集體生產之良策，同時亦爲增加戰時生產，鞏固民族陣線之急務。在實行生產合作，運輸合作，購買合作，販賣合作之程序中，中小工業之利益得以保障，且可進而以合作社之團結力量，與大工業協商調整，共策抗戰政策之推行。所有國防經濟，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等國策，皆可通過合作社之組織而更易實施，工業合作運動之意義至大，匪可漠視。

(八) 合理的編配工業各部門——建立國防工業體制之重要手續，即爲工業各部門之合理的集中抗戰之編配。我國戰時工業系統編配之方式，鄙意應以動力工業與機械工業爲中樞，軍需器材工業爲第一外圍，民生輕工業爲第二外圍，一般零細工業爲最後外圍，形成輕重有別，互相爲用的有機的系統，較爲合理。

## 蘇聯的合作制與三民主義的合作制

劉耀榮

把合作制度認爲是一種和平的經濟革命，足以推翻資本主義，是一般連環學派的合作經濟學者底最庸俗，最膚淺的主張。這種主張在理論上，一、忽略了每一社會內的意識形態，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的範疇，亦即是說，這個意識形態底時代任務，是被決定於其所存在的社會底政治經濟制度的，二、不認識所謂革命的意義。純經濟的社會革命是沒有的。經濟雖然是社會的基礎，又是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所以，經濟的發展不能不被決定於所被領導的政治力量。猶之乎有三民主義的政權，才有三民主義的經濟建設。在現實上，她沒視了資本

主義底統治力量，沒視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的矛盾，而且更離開金融資本底寡頭政治的支配性的現階段的社會。所以，微特他們底形而上的理論，沒有貫徹着現實，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度中，合作只能發生消極的作用，而其發展亦停滯於一定的階段。

但是，在比資本主義爲進步的社會中，合作却取得截然不同而具着切實革命性的意義的。這種進步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社會與三民主義的社會。因爲在這種社會之下，進步的革命政權取着領導的統治力量，社會裏的任何意識底內容和現象，都被決定於革命的三民主義或社會主義而發展。在這場合，合作是脫離了一切資本主義的要素所支配，而取得新社會的內容了。

在理論的範疇內，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有一致性的。總理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又是共產主義；又說：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實現；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不過，由於國度的不同，客觀環境之各異，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與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是各有不同的途徑的。比如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是以無產階級的政權為領導；然而我們的三民主義政權，是着重階段之調和的。因此，合作在兩個主義底體制建設中，亦担着不同的任務和發展。

這裏，我們分別來研究兩種合作制度罷。

## 一一

先說蘇聯

列甯說過：「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是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在人民最大限度的合作社會化的條件下，社會主義自然而然的會發達到目的。爲什麼合作化新等於社會主義的制度呢？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縱使合作是廣泛化，然而由於資本主義資本制度之存在，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依然存在。價格的法則依然發生作用，同時，更由於都市與農村之不平衡的對立，都市剝削農村的基本條件，合作的發展只停滯於一定階段。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下，因爲政權已落在蘇維埃的手中，這一個政權協助着排擠私人資本，改造農民經濟生產工具更加積聚與集中於無產階級國家的手中，同樣也就協助着一般的市場關係（即無政府狀態）底克服。換句話說，即能對經濟有計劃的領導，消滅農村與都市的不平衡。所以合作制在這裏是沒有受着資本主義社會諸條件所支配而失去其時代的任務的。不特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幫助人民組織的新原則之下，許多經濟的，財政的，銀行的特權，都交給合作社，所以合作社更得飛躍的廣泛的發展。伊里奇對於資本主義的合作制與社會主義的合作制，有如下的指出：

「……無疑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之下，合作社是集體的

資本主義的機關，同樣也無疑的，在我們現在經濟的實際情況下，當我們把私人資本的企業（但是這些私人資本的企業，是建築

在公有的土地上，受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的監督）與澈底的社會主義形式的企業（生產工具，建築企業的土地，以及整個的企業都是屬於國家的）相聯合起來，那麼，這裏還發生一個問題，就是第三種形式的企業。從原則的，意義的觀點上來說，這種企業以前是沒有獨立性，這就是關於合作社企業。在私人資本主義之下，合作社企業與私人的企業的區別，就好像集體的企業與私人的企業一樣。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合作社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社企業第一是私人的，第二是集體的。在我們現存制度之下，合作社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區別，就是合作社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没有區別，要是牠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是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工具的下面的話」。

又說：「實際上，國家政權握有一切大的生產工具，國家政權是在無產階級的手裏。無產階級與數千百萬小的和極小的農民聯合起來，在此聯合中，無產階級握有對於農的領導權等等，難道這還不夠從合作制，僅僅從合作制一方面，來建設社會主義嗎？難道這還不是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必須的條件麼？這自然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完成，這是此種建設完成之一切必須的充足條件」。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合作制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合作制不同意的地方。因爲合作制在後一個社會中，完全具有純粹集體的性質，同時發展於有計劃的有領導的經濟組織之內。所以，無疑地，「在我們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的」。

而且，社會主義的合作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合作制另外更不同的地方，就是後者的合作制是主要地在農民的階層中展開的。斯大林說：

「在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裏，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



統」。

合作社何以能成爲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關鍵呢？關於這，可分兩點來說：其一，爲甚麼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要經過合作社；其二，合作社對於農民所發生的效用。

一 農村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所以要經過合作社，斯大林已經指出：「決不可以把俄國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爲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牠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勞動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這兩個原因，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的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百千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發展那種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底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民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

合作制度對於農村所發生的效用，不用說，是把小農從農村的資本主義殘餘解放出來，作爲和資本主義的殘餘——富農作鬥爭的工具；同時，另一方面，由於合作社所具有的機能，地賦與農民以高水準的文化和集體的意識，因爲農民的性質，在過去，素來是游離的。

伊里奇對於合作社底效用，曾指出如下數點：

廣泛的合作化，就是「使我們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查，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的支配」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的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的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種過渡比較複雜，

但是牠如果成功，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於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

「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對農民的文化工作。在農民中的這個文化工作，就是經濟的目的，因此就是合作社化。在完全的合作社化的條件下，那末，我們兩個腳就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站穩了」。

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制，在發展的形態上，亦有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形式的發展，只限于初步的以至聯合的合作形式，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社形式之發展，却達到更高型。「當廣大的集體農場還沒有造成的時候，那麼所謂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自然就是初步的合作形式，即銷售的和供給的合作社；可是，當高度的合作形式即集體農場形式已跑上舞台的時候，那末集體農場就成了鄉村發展的大道了」。「集體農場是合作社的一種，是生產合作之最明顯的，最高級的一種」（斯大林）

所以，合作制在蘇聯，其中點是一種生產組織形式。怎樣稱呼這種生產形式呢？據斯大林說：這是農業方面之國家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家庭系統。

### 三

那末，在我們底民生主義的社會中，合作却又盡着怎樣的時代任務和社會的意義呢？

我國是以三民主義爲立國之大本的。任何一種運動，任何一種組織，不能不以三民主義爲依歸；換句話說，每一社會運動，每一社會組織，其內容，其發展，必然的要受着三民主義底原則所支配決定，始能實踐其時代的歷史的意義。

三民主義的實施，在具體方面來說，可分兩個推進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民族主義之發揚與民權主義之實現，亦即是說，要把我國從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狀態下解放出來。爲了脫離半殖民地的狀態

我們必然要完成，對民族革命成功有決定作用的，勝利的對日戰爭；爲了脫離半封建的停滯不前的經濟狀態，必然的要實現民族革命，即實現民權政治，始能排除一切封建殘餘。這兩個革命是在民族革命最尖端的形態——對日民族解放戰爭這一個過程中完成的。因爲要使民族革命戰爭成功，其內是要排除封建殘餘，發展經濟生產力，充實抗戰的經濟資源。而這却有待於民主政治之實現，始克實現的。在民權主義實施之下，政治的和軍事的動員，取得自下而上的民衆自動的方式；經濟的動員，則脫離半封建制度的桎梏，生產力得以擴大地發展。可以說，在第一階段中，民族革命促進民權政治的實現，而民權政治則反過來加速民族革命勝利的完成。

第二個階段，就是民生主義社會的建立。民族革命和民權政治爲民生主義具備了社會建設的基礎條件。所以謂民生主義社會，就是指的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社會主義社會。

合作在這兩個階段中，盡着怎樣的任務呢？

在第一階段中，合作不只有經濟的意義，而且有政治的意義。所謂經濟的意義，第一，牠可改善民衆的經濟生活，遠取抗戰中安定民生以至改善民生的條件。例如信用合作可使中小農及都市小生產者避免高利貸之壓迫，消費合作可減輕在戰爭期中所必然會發生的物價高漲的程度，第二，在這種改善下，農民的和都市的小生產者不只提高個人的生產效率，而且把合作廣泛化，牠將成爲發展戰時生產之支柱，例如工業合作運動，就是適應民族革命戰爭期中所引起的種種變化之下而順應的一種生產力擴充的運動，一種從手工業的生產改進到輕工業的機器生產和配合重工業生產的合作更爲高型的運動。

所謂政治的意義，是很顯的。合作社從性質上是集體的組織。在集體的工作生活和共同目標中，合作員自然被賦與濃厚的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透過各合作組織底縱橫的聯繫，必成爲民族團結意識的強勁基礎。從內容上是民主的組織。從一人一原制，盈利分配，以至各種平等的權利，責任與義務的規定，合作無疑地賦與合作員民權意識的訓練和印象。而且，合作社除其本身事業外，更從事各種文化

事業之建樹。這提高合作員的文化水準，與合作組織內之民主印象相配合，無形的是訓練民衆行使民權主義所規定的五權，由是而提高民衆底政治意識。所以合作不只實現經濟的民權主義，而且把各種合作社作爲個別的單位而具有政治的觀點時，牠實有類於職業代表制度。

所以，透過合作運動，民族意識不但加強的鞏固起來，而且能訓練和提高落後的農村民衆底民權主義的認識。在合作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民衆政治意識的提高，民權政治之實現，自然水到渠成了。

所以，透過合作運動，抗戰的中區機關不但可以實現自上而下的經濟動員，而且又實現自下而上的政治動員。合作在中國，雖然不能爲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但無疑地將成爲保證勝利的因素。

至若民生主義的社會中，合作更取得決定的經濟的意義。

如果民族革命和民權政治奠定民生主義社會的前提條件，則合作政策爲中心而展開的——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關於節制資本，實踐的原則上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大規模的企業國營，小規模的企業民營。國營，無疑就是國家資本，這是很具體的。但是說到民營，內容是較複雜了。如果所謂民營的解釋，是一切輕工業和小規模企業的經營，似採取着資本主義式的私人資本底股份公司形態，這種保存私人資本的組織存在，結果還是免不了資本主義條件之發展的。因爲資本是不斷在運動中，是不斷地投在再生產過程裏頭，在這過程中，資本是不斷地擴大。所以由上述的實踐原則而來「一節制資本」，結果是否定的。雖然在民生主義社會中，一切經濟行動將爲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領導，然而如果沒有足以澈底限制私人資本發展之機構，經濟行動反將爲逐漸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所制約。然而怎樣代替了這種私人資本主義呢？那只有實現廣泛的合作化。即是說，輕工業和小規模的企業都採取合作經營的形式。只有集體的，民主的合作經濟，才排擠了私人資本主義底運動的法則。這樣，一方面是國營企業系統，一方面是集體的合作社系統。這兩個系統的企業，統一於一個經濟行政的最高機關——民生主義社會政權，然後

方能樹立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體系。

在農村，合作制更成爲核心的機構。民生主義社會的農業，是一耕者有其田的狀態。但是「耕者有其田」，並不是說在土地分配後仍處於零碎經營的狀態下的意義，還要採用集體經營方能徹底實現的。第一，農業經營進步的方式，必然要採用集體經營。只有在集體經營之下，農業方能工業化，機械化，而擴大和提高生產力。第二，所謂「耕者有其田」底真正意義，其解釋並不限於每個農民都能分配一定的土地而已；合理的解釋，應作爲：每個農業勞動者都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把他底勞力貢獻於農業生產，同時並能獲得相等於他底生活上水準所以必需的報酬。到這場合，才是耕者有其田底實現。而實現的方法，無疑地是集體經營的合作制。第三，民生主義下的農業經濟也是必然有計劃和有組織的。他必然要適應工業發展而發展。怎樣才能有計劃和有組織呢？其一，自然是集體經營。把每個集體經營的單位聯結而做成一定的系統，分計劃的和分配的農業生產。其二，依地理的條件，分配各類農業部門底經營地域。這種巨大規模的合

理化的農業生產，一部固然可靠國營，一部亦必需靠自集體的組織。

所以，爲着「耕者有其田」的理論，爲着使社會得以作秩序的，經濟機構得有配合的發展，必須運用體現集體經營的合作制。

合作對於民生主義社會之具有決定的經濟意義，就是如此。自然，這個意義和蘇聯的合作制意義又是不同的。雖然在作爲社會經濟的一個基本支柱，兩個國家都是一樣，不過在蘇聯，合作制是具有階級鬥爭的意識，是消滅富農兼固無產者政權的手段；而民生主義的合作制則集中在階級調和底目的，這階級調和自有着地底政治的前提。這前提，就是經過把內在矛盾統一於外在矛盾的民族革命戰爭後所以產的生統一陣綫政權。這個政權以執行三民主義爲其基本的使命。所以他能保證着合作制度是會達取其實現民生主義階級協調底目的。

自然最後要附帶說出的，爲使合作制有順遂的，不受窒礙的發展，國家在共輔助作用的經濟政策上，有某一點與蘇聯同樣的：就是須把一部分的經濟的，財政的，及銀行的特權交給合作社。(完)

## 履畝稅之研究

周伯棣

筆者自兩週以來，連作三代的財政組織及井田制與貢助徵法兩文，分寄滬滬兩地，茲復續作本文，以獻本刊；自知「始」之物，其形必醜；「不謀莊拙，亦冀就正于大雅而已。伯棣識

### 一 最初的地稅

中國以農立國，財政收入的重心，亦在乎農業稅，即所謂田賦是也。田賦的稅本 (Steuertfonds) 既在乎農田，故田賦的形式，亦常隨田制而變遷；但田制的形成，又常隨整個社會經濟而殊異。申言之，在地廣人稀，民少政簡的時代，所謂社會，常爲農業共產社會，所謂田制，常爲公田制。彼時四民 (士農工商) 不分，所謂人民大抵即是農民。故彼時可實行井田制，(殷周兩代) 以井田制爲基礎，而實行其

所謂(貢)助徵的田賦法。但到了後來，整個的社會經濟進步，人民分化，四民有別，所謂農業社會，也就進化而爲農業私產社會。所謂田制，也就進化而爲私田制，於是所謂農業稅的田賦，也就由地租 (Rent of land) 進化而爲地稅 (Land tax) 的形式了。(關於此點，已於井田制與貢助徵法一文中詳論之，此處不贅)

就一般說來，夏殷周三代，在田賦(彼時所謂田賦實即地租)方面，是實行貢助徵法的；但按之實際，周代八百七十二年，其中約英有五百年，號稱春秋戰國時代，在那春秋戰國時代，周室式微，羣雄

割據，「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故在社會經濟方面，封建制度，漸就崩壞，土地私有制度，漸見實現；在國家財政方面，國務增加，經費膨脹，而田賦的征收，亦不能不謀增加，於是與土地的日見私有相依附，而履畝稅遂已成立。實言之，因財政上的必要，而須行履畝稅，因履畝稅的成立，而益促土地私有制（私田制）的確立。

這履畝稅才是一種中國最初的地稅（Land tax），在本質上已不是一種地租（Rent of land）。所以它是值得我們對此最初的地稅而加以一種研究。

## 一一 履畝稅為何實行

在貢助徵法的時候，田賦（即地稅）與地租並不分離，到了履畝稅，這兩者始見分離（田賦與地租分離）了。

然則這使田賦與地租互相分離的履畝稅，為何必須實行呢？這綜括其原因不外二端：——

1. 四民分化——古時地廣人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所謂人民，便是農民，人民各有分地，什一而稅，租稅公平，不言而喻；但到春秋之世，經濟進步，四民分化；士農工商，不一而足；於是除田賦之外，設市廛之稅，關市之稅以課商；而於農稅的征收，亦不能不更求完密，故履畝稅創焉。

士農工商之分化，初見於穀梁成公元年；其後「宣王既傷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曰：『民不可料也，』」；料，數也，即今日之人口調查，此人口調查之必要，蓋亦由於四民之分化。

另之，到了經濟進步四民分化，以力租為田賦，已不適宜。

2. 經費膨脹——春秋戰國之世，羣雄角逐，戰爭頻繁，軍費增加，經費膨脹，事所當然。故井田制下，什一所入，不足供應，遂不得不增加舊稅，創立新稅；此新稅之創立，多着眼於工商，而舊稅之增加，則着眼於田賦，此即履畝稅是。

最初實行履畝稅的地方，是魯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春秋）是即履畝而稅。所謂「初稅畝」，照杜預所注，以為公田之法

，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是即十取其二。易言之，在貢助徵法的稅率為十分之一，在履畝稅的稅率，已為十分之二。此有類今日地方之田賦，加多一征！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盡徹乎？』公曰：『二，（即十分之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這便是國用不足，有若勸哀公重行徵法，徵法的稅率為什一（十分之一），履畝稅的稅率為十分之二，彼時哀公已行履畝稅，抽着十分之二的稅，然而還嫌入不敷出，如再改用徵法，自然更其不夠了。這便證明履畝稅的稅率為十分之二。

然則履畝稅為何始行於魯國？這也有兩個原因：——

1. 由於人民的怠工——「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見文獻考卷一，第十頁）

2. 由於記載的詳略——孔子為魯人，其作春秋，於魯之事特詳，故關於履畝稅僅記魯事。其實其他各國，亦還同樣的實行履畝稅，茲舉三點以為證：

a. 孟子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這個話是對一般諸侯而說的。是可知彼時各國，大抵均行履畝稅了。

b. 齊語管仲對齊桓公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齊語）即視土地之善惡及其所生，以定征賦之重輕，這又為履畝稅。

c.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吾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處所謂田有封洫，亦為履畝稅之證。

為增加歲入而行履畝稅，故實行履畝稅而增加稅收，乃屬意中之事，我們且以魏國的情形為證：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賢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增，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文獻通考卷一第廿二頁）

由上述一段話，從側面觀察，可知實行履畝稅，租賦確是增加了一倍。——即「增倍於常。」

### 三 履畝稅的發展

各國實行履畝稅，大抵尚沒有把井田制徹底廢除，但到了戰國的秦始用商鞅之法，正式把公田制宣告死刑，而允許土地作無限制的買賣。

據史記秦本紀所載：

「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此處所謂賦，乃制貢賦之法。所謂開阡陌，即撤除阡陌，廢除井田之謂。阡陌爲田間小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阡陌爲古制，至此始爲秦所徹底破壞，此在田賦上，即廢徹法而徹底實行履畝稅之意。至此人民得自由收買土地，私有土地，而國家對此私有土地，課以賦稅；故田賦雖劃取地租之一部分，而已與地租劃分了。這樣的田賦，才是嚴格意味的田賦。

關於開阡陌許私有的事，我們且引通典上的一段話如下：

「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而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併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畝爲畔，無復限制矣。」（通典卷一第十三頁）

次之我們再引朱熹對於開阡陌的批評如下：

「……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其歸授

之際，必不免於煩擾欺誑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誑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賦，以嚴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逐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朱子對於商鞅，可說是抨擊甚烈。但按之實際，田制之於社會經濟，好比是衣服之於人身，小孩穿小衣服，身體漸大，衣服亦須漸大，決不能強成人去穿小孩的衣服；井田制只適宜於經濟幼稚之社會——例如地廣人稀四民不分的社會，不適宜於經濟發達的社會；所以商鞅的開阡陌，許私田，從經濟史的進化來說，正如成人改穿成人的衣服，本是無可非議，朱子因於成見，自然是不甚妥當的。

商鞅爲開阡陌，又用來民之法，以廣事墾殖。這因爲秦地廣人稀，不能盡耕，貨棄於地，於國於民，兩皆有損，但欲盡地力，自有待於人工；恰巧秦之鄰國——三晉（韓趙魏），土狹民衆，人浮於地，而韓魏又適爲秦之敵國，於是商鞅主張招徠三晉之民以闢草萊之地，是損敵即所以利秦。且商鞅使這些招來之民，「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通典卷一第四頁）以免有倒戈之患。

商鞅的這個辦法，果然是十分成功，「數年之內，國富兵強，天下無敵。」（通典卷一第四頁）這可見商鞅所設計的財政計劃，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是恰合「量體裁衣」這句俗話了。

### 四 履畝稅之性質

履畝稅是最初的地稅；但地稅之中，因其課稅方法的不同，可分爲面積課稅，等級課稅，收護課稅，地價課稅，佃租課稅，收益冊冊課稅幾種，履畝稅又屬那一種呢？

這大體言之，是屬於最幼稚的一種面積稅。它是土地之面積大

小，爲課稅標準，易言之，以面積的廣狹爲轉移，不問土地的肥瘠的。關於這點，可以杜預注爲證明：——

「既助其公田，又履其私畝，是爲十而稅二。」

徹法既以面積爲準，又據數年之穫以爲貢，故在本質上實爲一種面積稅，現在履畝稅因之，而加征一征，其仍爲面積稅無疑。

不過，在實行井田制度已歷有年所的地方，面積的大小，固早有定評，而在草萊初闢之地，耕地實測困難，課稅難免不公平。則人民怨望，所在多有。例如秦開阡陌之後，便有這樣的情形；爲補救這個弊害，秦孝公廢地稅，賦戶捐。地稅本屬物稅，秦孝公把它作爲人稅來課賦。我們且引通典的一段話以爲證：

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井而自若……（通典卷四第六頁）

原來由歷史的眼光來看，地稅有以物稅課賦者，有以人稅課賦者，在以人稅課賦時，又可分爲從戶稅與從丁稅兩種，從戶稅，實始於秦孝公。

最後，各地的情形不同，魯國起初所行者爲面積稅，秦所行者爲從戶者，而齊國所行者則似爲等級稅；此考之於「相地而衰征」（見前）是可以推定的。

## 五 餘論

履畝稅始於春秋時代，降至近世之田賦，在性質上，固猶屬於一

## 論戰時財政上的銀行信用

銀行信用曾經怎樣直接地被運用爲戰時財政的一種手段？和這種手段，從國民經濟上看來，是不是一種合理的手段？讓我們先把前一個問題作一個歷史的考察，再來給予後一個問題以學理的評價吧。

我們最好讀一讀法蘭西銀行的歷史。

種履畝稅，即今日土地私有，所謂田賦仍是劃地租之一部分以形成者也。（自耕農是假定佃農右田主與佃農的兩種身份。因之他的收益之中，一部分是地租，地租之中，一部分是田賦）此履畝稅是否可以廢除，須視土地私有制是否可以廢除以爲斷。

說到土地私有制的是可以廢除，先須問土地性質，是否適於公有。原土地的使用，與其他的財物不同，土地的使用，貴盡地力。要使土地盡其地力，必須使土地隨時改良（Melioration）但要獲得此種改良的效果，如全屬公有，由國家雇人耕種，殊難達到目的，故土地澈底公有是不行的。

然而土地完全私有，反使多數的土地，完全集中於「紳糧」或「不在地主」（Absent land lord）之手，那麼那些不在地主，固也不會對於土地的改良，加以注意，而其租佃人，因物不屬己，過得一年算一年，也決不會對於土地多加改良的。

所以爲救此弊，不妨由國家買去地主（to buy the land lord out）使土地在名義上歸國家所有，然後再以永業田的辦法，由國家長期租售給農人，使農人有耕作權，聊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如此農人對於土地，雖無全部的所有權（所謂所有權包括使用，售貸處分三種權）但他們有確定的使用權，這樣，他們可竭其全力，安心改良土地，而使地得盡其力。

在這樣的情形下，土地仍可公有，（唯耕作權——即使用權保爲私有）於是國家的田賦，得并地租，田賦而爲一，不在地主之弊庶可滅絕；且國家代行地主之職，田賦的收入亦必可增加了。

## 李宏略

在普法戰爭期間中，法蘭西銀行曾留下不少光榮的印象。色當之戰，拿破崙第三被俘以後，法蘭西銀行對國防政府依然忠於其任務。甚至普軍攻入巴黎，國府遷都，而法蘭西銀行總裁盧爾與副總裁德勃郎兩氏仍留守巴黎，苦心竭慮地爲國家效勞。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八日

的暴動，德勃郎親率行員抵禦暴徒的襲擊；結果，金庫中的六億法郎，賴以保持，所損失的，不過一千七百萬法郎而已。這一故事，至今尚為一般金融家所稱道。

有人說，法蘭西銀行，對於國防政府，不是一個單純的奴隸，而是其忠僕。我很認為這的確是事實。法蘭西銀行在風雨飄搖的環境中，一面支持國家財政，一面維護銀行信用；能夠拯救國家的貧困，而不為貧困的財政所左右，實不愧為一忠誠的僕人！

法國在這一期間的戰時公債政策，可以說是失敗的。由於戰事的失利，內債的發行，已陷入僵局。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國防政府遂以閣令，發行年利六厘，三十四年內抽籤償本的外債二億五千萬法郎；額面為五百法郎，共五十萬張，以每張四百二十五法郎（即八五折）的價格出售。但在當時，除了美國的摩根財團認銷五千萬法郎以外，便找不到其他的主顧。國防政府乃與摩根財團締約，把十二萬五千張債券，以每張四百法郎的價格，交由摩根財團推銷（手續費1.25%）。其餘三十七萬五千張則在英法兩國勸募（手續費2.5%）。結果，在英法兩國勸募的，仍剩下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三張，最後，又以每張四百十五法郎的價格售與摩根財團。全部實收不過二億零二百餘萬法郎，即僅佔原定總額的八二%。

普法戰役法國外債發行統計：

(一) 由摩根財團認銷者：	
債券	一二五,〇〇〇張
價格	四〇〇法郎
手續費	七八一二五〇法郎
實收額	四九二一八七五〇法郎
(二) 在英法兩國勸銷者：	
債券	三二七,四七七張
價格	四二五法郎
手續費	六,〇九三,九七五法郎

(三) 最後由摩根財團認銷者：  
實收額 一三三,〇八三,七五〇法郎  
債券 四七,五二三張

(四) 三項合計實收額  
實收額 一九,七二〇,〇四五法郎  
價格 二〇二,〇三二,一四五法郎

法蘭西戰時財政的困難情形，由此可以想像出來。最後的責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法蘭西銀行的肩上。由一八七〇年七月起至翌年七月止，一年中，法蘭西銀行貸給帝國政府及國防政府的款項，前後十四次，總額達十四億七千萬法郎；較外債所得超過七倍有餘。

普法戰役法蘭西銀行貸給政府款項統計：

一八七〇年：	
七月十八日	五〇,〇〇〇(單位一千法郎)
八月十八日	五〇,〇〇〇
十九日	四〇,〇〇〇
九月廿四日	七五,〇〇〇
十二月五日(在巴黎)	一〇〇,〇〇〇
十二月五日(在新都)	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一年：	
一月十一日	四〇〇,〇〇〇
三月十三日	五〇,〇〇〇
四月十五日	七五,〇〇〇
五月十七日	一五〇,〇〇〇
五月三十日	九〇,〇〇〇
六月十日	五〇,〇〇〇
(日期不明)	三〇,〇〇〇
七月(日期不明)	二一〇,〇〇〇
合計	一,四七〇,〇〇〇

法蘭西銀行雖然貸給政府以偌大的款項，但其本身的信用却無絲毫

持不墜。當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四日最高發行額提高到二十四億法郎的時候，法蘭西銀行券曾有一五%的跌落，不久即恢復原狀；特別以法郎，十法郎和五法郎的小額銀行券的價值始終未嘗動搖。

這樣看來，我們把普法戰役的法蘭西銀行，稱為戰時中央銀行的典型，的確不算是過譽之辭罷！

從這時候起，法蘭西銀行便和法國的戰時財政結了不解之緣。如果要指出歐戰的前夕，法國當局對於未來戰爭的財政上的準備，那麼，所謂準備是很簡單的，不外就是一九一一年九月末，政府與法蘭西銀行所訂立的祕密協定。這一協定的內容，是：戰爭爆發以後，法政府得由法蘭西銀行和阿爾及利亞銀行借入款項，法蘭西銀行以二十九億法郎為最高限度，阿爾及利亞銀行則以五百萬法郎為最高限度。

歐戰期間，法蘭西銀行不僅履行了它的義務，而且超出了原來契約上的範圍，在一九一四年底，法蘭西銀行借給政府的淨數，已達三十九億法郎，到一九一八年底共達一百七十三億三千五百萬法郎。

歐戰期間法蘭西銀行貸與政府之淨數：

一九一四年底	三，九〇〇，〇〇〇千法郎
一九一五	五，〇七五，〇〇〇
一九一六	七，四二五，〇〇〇
一九一七	一二，五八五，〇〇〇
一九一八	一七，三三五，〇〇〇

如果要知道法蘭西銀行貸與政府的總數，那就一定要把已償還的借款的數目加上；到一九一八年底止，這項數目約為九十億法郎。所以，在歐戰期間，法蘭西銀行貸與政府的總數。實在二百六十億法郎以上。

工業區域的被占領和被破壞，使法國的租稅收入大受打擊，法國政府雖亦採行增稅的方法，可是，在四年另八個月的期間，經常收入的總數，不過二百億法郎，而戰前的每年平均則在五十億法郎以上。增稅方法不能作為戰費的一個源泉，使法國的戰時財政拮据萬分。爲了支付有如天文數字一樣多位的戰費，結局不能不靠着公債和銀行貸

款來挹注，自是必然的事實。

歐戰期間法國的財政政策，的確不足爲範；和別國，尤其是英國和德國比較起來，是要大大失色的！這一點連法國學者自己也毫不掩飾。列如日士(Gaston Jéze)在法國戰時財政一書裏，便說道：『法國的戰時財政是最惡劣不過的財政政策的代表！』(The War Finance of France, P. 112)的話。

然而，實際上，倚賴銀行信用的，却不只法國。運用銀行信用，直接作為戰時財政的一種手段，這種政策，在英德兩國，也同樣被實行。

波卡德(E. L. Bogart)說得好：『世界大戰時，各交戰國政府，都間接直接的儘量利用銀行的協助以籌鉅款。交戰國家，差不多沒有例外，於戰事初起時，都要求本國中央銀行，立刻墊款，以支付動員及最初軍事行動的經費。雖然這些墊款，後來發行第一戰時公債時，大都歸還，至少還清一部份；但是，各個政府，仍不斷的要求銀行繼續墊款。到了戰時終了時，各國政府，事實上無不積欠本國銀行巨額的借款。』

銀行信用，在戰事初起時，一般地以墊款的形態(Bank advance)被採用爲財政動員工作的一種緊急手段。誰都知道，在近代的戰爭，時間是一個決勝的要素。誰能夠最敏捷地集結自己的兵力，誰能夠最迅速地布置一切軍事的動作，換言之，誰的動員工作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做得最好，誰就可以占得最大優勢。同時，誰都知道，近代戰爭的軍事動員，需要一筆鉅額的經費，從而，它必須有同樣迅速和敏捷的財政的動員工作爲基礎。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中國這一句老話，恰好拿來解釋這種密切的關係。財政的動員，和戰費的正常的籌措，並不相同，它完全不能有時間上的遲緩和等待。例德國的動員費共達二十二億七千萬馬克，支付的期間，僅是非常短促的一個月內。所以，財政的動員，不能賴于公債政策，也不能倚賴于增稅政策，是很顯明的。德國戰前的財政準備工作，被認爲最詳密，只有她才擁有鉅額的軍事基金；可是，藏于斯班道要塞(Spandau)的一億二千萬馬克



的軍事基金，不過相當于動員費總額的十分之一。別的国家，雖然亦用盡一切方法去解決這種急如星火的要求，如像英國的挪用減債基金，法國的移撥軍部經費的餘額……但其效用之微，也是誰都可以想像出來的。

因此，銀行信用之被採用為戰時財政動員上的主要的緊急手段，自是毋須乎再加什麼說明的一種必然的結果。英國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卅一日止，由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借入的臨時墊款，共計六千二百六十六萬鎊。德國到（一九一四年）九月來正取向國家銀行貼現的財政部證券，共發出二十三億馬克（Treasury bill）。

我們在上面，曾引過波卡德的話，說各國政府都繼續要求銀行墊款，以支付戰費。政府倚賴銀行信用以籌措戰費的方法，主要可以區分為兩種方法，一是直接向銀行要求臨時的墊款，如像法國，這種臨時墊款，是很簡單的一種舉債方法，性質等于短期的流動公債。另一種方法是發行財政部證券向銀行貼現，然後以發行長期公債的收入來清結債務，如像德國的例。法國的情形，已見上述；德國的財政部證券的發行總額，即代表國家銀行貸與政府的數目，在一九一八年，共達二百四十四億一千六百萬馬克。英國政府的倚賴英倫銀行所墊款

，雖然比較有限制，但到一九一九年五月末為止，也達四億五千七百萬鎊。由此觀之，銀行信用之被運用為籌措戰費的一種手段，在各國都是占着重要的地位。

動員的費用，一部或全部取給于銀行的墊款，這不只是比較優良，恐怕還是唯一可能的途徑吧！在近代戰爭，動員的費用是這樣鉅大，斷不是平時所積累的戰事基金所能應付。所以，不必說過去，即在將來，任何一個交戰國家的動員費用，都必須依賴于銀行信用是毫無疑義的！

至于戰費之正常的籌措，那就值得我們的考慮了。

依賴銀行信用以措戰費，像法國的方法，實際上是以信用的形式替政府創造大量的購買力，很容易陷于膨脹通貨。德國的方法，一看之下好像不會有什麼毛病，但實行起來，却不一定獲得完滿的結果；它會隨着公債政策的失敗而發生破綻。德國在發行第五回公債時已發生問題，到第九回公債發行後，未能償還的財政部證券，共達三百八十九億七千萬馬克，這個數額，表示銀行替政府所創造的購買力的數量。這一實例，提示了德國的方法，同樣都會有陷于膨脹通貨的危險。

戰時公債	發行年月	公債應債額	未償還之材部證券額	超過或不足額
第一回	一九一四年九月	四, 四六〇(百萬馬克)	二, 六三二(百萬馬克)	一, 八三二(百萬馬克)
第二回	一九一五年三月	九, 〇六〇	七, 二〇九	一, 八五一
第三回	一九一五年九月	一一, 一〇一	九, 六九一	二, 四一〇
第四回	一九一六年三月	一〇, 七一一	一〇, 三八八	三二四
第五回	一九一六年九月	一〇, 六五二	一二, 七六六	二, 一四四
第六回	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三, 一一二	一四, 八五五	六, 七三二
第七回	一九一七年九月	一二, 六二六	二七, 二〇四	一四, 五七八
第八回	一九一八年三月	一五, 〇〇一	三八, 九七一	二三, 九七〇
第九回	一九一八年九月	一〇, 四四三	四九, 四一四	三八, 九七一

(+) 超過

(-) 不足

法蘭西銀行在歐戰時，爲了這一件事曾經和法國政府吵過嘴。法蘭西銀行董事會認爲銀行替政府墊款，以支付戰費，僅能到在最危急的時期，政府不能取得任何其他財源的場合，才成爲可以採用的手段。如果讓這種辦法繼續進行下去，則其勢必將陷公共信用于危險的境地！我們對於法蘭西銀行這種意見，大體上是贊同的。

然則爲什麼在歐戰期間，各國的財政當局都不能夠避免這種手段的採用呢？一句話，這是由於一種政治上的短見在其中作祟。由於這種短見，首先使它們認爲戰事的期間不會延長，例如德國政府當局自始就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對戰事的預測十分樂觀，認爲在一九一五年秋季即可結束。英國政府的當局甚至以爲六個月後即可恢復和平。其次是使他們過低地估計了戰爭的費用。柏林大學名譽教授李雪爾（

## 戰時公債論

### （一）公債政策在戰時財政上的重要性

戰爭是一種體現社會經濟制度和內在矛盾的產物，即是由於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矛盾而產生出來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所有的基本矛盾，都以最尖銳而強烈的形態表現出來。從而使使掠奪性的戰爭之爆發，形成必然的結果。同時在另一方面，那正義性的革命戰爭，亦以雄勁的姿態而出現，它是包含着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與蘇聯二大勢力之團結，具着反抗和剷除帝國主義存在的傾向。

由於人類文明的進步，現代化的戰爭，其勝敗的條件，已經不是單基于兩方在戰場上底兵力的對比，而是決定于兩方底整個國家力量諸條件，特別是要聯繫到經濟問題上。所以，便有人強調地說，戰爭第一需要錢，第二需要錢，第三也需要錢。的確，所謂三M主義（Money, Munition, Money），也是以錢爲基礎的。

爲了要支持戰爭，就要準備充足的財力，而且這個財力的大小，是比例于其戰爭的規模和期間；愈是現代化的戰爭，其所需的財力，

J. Riesser) 博士在一九一三年再版的財政上的備戰與作戰 (Finanzie le Kriegsbereitschaft und Kriegsführung) 一書裏，推算德國每年所需要的戰費，僅六五億七千萬馬克了。美國參戰較遲，但對戰費的推算也沒有把握。鼎鼎大名的財政學者塞力格曼教授 (Edwin R. A. Seligman) 估計年需十億萬元，許多人還嫌太高。那裏知道參戰後，送到議會的預算表中，戰費的總額已達十九億元，塞力格曼的估計，剛得一半。由於這些估計的錯誤，影響到財政政策，使各國財政當局常常抱持苟且的態度，一到軍事上對於費用的需求急如星火的時候，便不能不乞靈于如像銀行墊款的一類的臨時的方法，再沒有選擇手段的猶豫時間了！這種覆轍，我們是不能再踏上的！

### 嚴顯郁

就愈有龐大的傾向。這是不着爭論的。但是一般說來，戰費的籌措方法，在積極方面，通常是發行公債，提高舊稅，增設新稅，增發紙幣，增加輸出以換取外幣，向外借款（雖然是以貨幣爲計算單位，但歸根到底還是採取商品，在戰時特別是軍需品的形而爲交付的）等方法；後面兩種乃是動員國外財力的方法，至於動員國內財力的主要手段，無疑地是要寄託在公債政策（但外債例外），和增加租稅政策上。麥克萊氏 (Macadoo) 主張的五十理論 (Theory of Fifty on Sixty) 就是認爲戰時財政，應半靠租稅，半靠公債的。我們考察一下世界第一次帝國主義性的大戰時，各國戰費來源中，公債所佔的比率，就可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年份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美	英	義	德	法
	二六·九四	四四·三五	五〇·三九	五九·八八	七二·六八

同時，在現階段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性戰爭的氛圍，經已瀰漫着整個世界的場合下，列強中除了有少數的國家，在表面上還是在所謂和平圈裏生長着，實質上我們可以大體上說：每個列強都已捲入了戰爭的漩渦中。由此而生的準戰時，以至戰時體制的財政膨脹上，那公債政策，也被視作經費籌措方法裏底有決定意義的勁旅。比方一九四〇年的日本預算案中，依存于公債的經費來源，就佔了全部歲入的百分之五二以上。

### (一) 戰時公債政策的社會性

公債乃是國家基于公家信用，以債券形態，對於將來的勞動者底剩餘價值，預期地施以榨取的手段。爲了有效地行使這種手段，有時是採取自由的勸募方法，但有時却又採取着強迫的攤派方法。的確，同樣地我們要把公債看作是一種體現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方能本質地把握着公債的理解。

年前才逝世的財政學權威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賽力格曼教授 (Prof. Edwin R. A. Seligman) 曾說過：「公債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只是預課的租稅 (Anticipated Taxes)。這種說法，顯然是陷于皮相而不完全的。我們一定要知道，公債曾經和現存的資本家暫時避免了租稅的負擔，特別是在實行資本稅制度的國家，資本家獲益更大——雖然這些負擔終極是可能轉嫁到勞動者底身上——而且給他們以一個很有利的投資機會，從而可以獲得很高的利息和額外的利潤。因爲由于財政支出的膨脹，假如不是以公債爲來源，而把負擔轉嫁到將來的勞動者底身上之外，不消說是要以租稅的形態，而要那些現存的資本家去替勞動者而墊支。現在既然由于公債政策的實施，便減輕了租稅在財政收入上的比重；同時，資本家對於公債的投資，不光是可以獲得規定的利息，這種利息有伴隨公債的膨脹而提高的傾向；而且由于名義價額和實際價額的差異，即是政府爲了誘導資本家的樂意購買公債，往往以低於債券面額的價格，或折扣的優待，而使資本家可以獲取額外的利潤。此外，我們還得指出：公債的全部利潤，除了

政府是採取強迫的攤派方法之外，一般來說，它一定要接近于一般的產業平均利潤率，否則爲了利潤而投資的資本家，是不會對利潤較低的公債的投資，表示「熱心」的——但我們並不否認：以自己底利益爲基礎，資本家也會在愛國的熱忱下，相當地願意稍爲吃虧而投資公債。

資本家可以通過公債的購買而膨脹自己的荷包，這固然招至了資本家投資公債的興趣，但公債本身，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也賦與了自身發展的條件。首先，債券可以自由地移轉利得的請求和支取，而不在于其一定的原來所有者，只在于其當時的持有人。其次，債券所代表的金額，常是可以大小的，因此，就成了投資底便利而靈活的對象之一，社會上的休閒資本，以至各階層所有的資本，都能由于公債的發行而集中到政府的國庫之中，近代財政的膨脹，由于公債政策的運用，實在給予了有力的幫助。此外，社會上擁有多量休閒資本的，用不着爭辯地說，要是那羣資本家，而這些資本家，由于大量地投資于公債，一方面的形成了資本家對於政府的尾巴性，他們的生死存亡，都依存于政府底財政的命運；但在別方面，政府又成了資本家的傀儡，一舉一動，都要首先獲取資本家的贊同，而爲他們所規制，否則資本家不特不再願意承受公債，而且因爲他們保持了已經發出的大量公債，足以搗亂公債的市場，而給財政以致命的打擊，因此又形成了資本家對政府的統治。此也可以部分地說明了財政資本的辯證法。

在我國過去十年來底慘烈的內戰中，也部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王承志先生說過：「在南京政府時期，公債發行額，逐年增加，至一九三一年達到空前的紀錄，這是由于國難臨頭，「剿匪」軍費支出浩繁所致」。這是多麼傷心的話啊！我們站在一「國家民族至上」的口號下，永遠永遠地決不希望有類似的歷史底重演！但我們願意爲抗日而出錢出力，甚至流血！

在這裏，我們要問：公債底本利的負擔，究竟是落到誰人的肩上了？一般來說，或者可以由于把敵人打敗了，而取償于戰敗國的賠款；但又很可能地會有部分的負擔，將來會由自己的政府，以課稅的財政手

段，仍然取償于人民，這些人民，大體上都是將來的勞動者。

庸俗的財政學者，以為只要那些公債的用途，能夠是在生產事業上，則公債便是對全體人民有利的，這完全是一歪曲事實的花言巧語。站在「剩餘價值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的觀點上，縱使政府把募債所得的錢，投到生產事業上，也不過徒然給資本家創造了榨取勞動者的一個契機而已。但在生產手段為生產者所同佔有的體制下，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為自己而生產，並不是為他人要獲取利潤而生產，那自然是沒有榨取的關係，在這樣的場合，為發展生產而發行公債，自然不能給予勞動者以被剝削的機會。近年來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底財政上，為了發展生產，公債也頗佔重要性，但我們並不能當它看作是一種榨取的手段，就是以這一點為理論的根據。至于為了帝國主義者的掠奪性的戰爭，以至財政膨脹，因而公債膨脹，那末雖然通過戰爭來鞏固國內的統治權，保障國內市場，佔有殖民地，開拓國外的市場，但這完全是資本家底私的利益，勞苦大眾却反而受了龐大的負擔和慘酷的剝削。不過，那些為了人類的幸福，為了人民的解放，以至像我們中國現在所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乃是正義性的戰爭，為了支持這種正義性的革命戰爭，我們人民雖然肩起了重大的負擔，也是合理的，值得稱頌的。

至于政府為動員國外財力而發行的國外公債，和國內公債並無實質上的差異，只是資本家享有的利益部分，落到了外國人的手上，但債權落到了在國外的僑民手上或國內人民以外幣來承銷了公債，則利益還是為本國籍的資本家所佔有着。而外債底本利的負擔，却和內債一樣地是本國將來的勞動者底避不開的責任。

### (三) 對通貨膨脹的調節作用

通貨膨脹，乃是在流通界裏的通貨(包含信用)數量，超過了以商品流通的圓滑為基礎，而規定的流通界所必要的流通手段量而發生的。這個「商品界流通過程所必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價格的

總額規定了，貨幣不過把商品價格總額所觀念地表現的金錢總額，實在地表現出來，這兩個總額的相等，乃係自明之事。但流通界所必要的流通手段量，對於貨幣的流通速度，構成了反比例的關係，即是「貨幣流通次數增加，則流通貨幣量減少；貨幣流通次數減少，則流通貨幣量增加」，所以，「流通手段量，決定于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與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

一般地說，公債的承受者，通常都是那羣擁有休閒資本的人們，特別是富翁和小有產者。這些休閒資本，部分地是存在于小有產者手中，或者是因為數量還小，不能立刻找到用途，便暫時地游離着，或變成銀行存款；但大部分還是在再生產過程中，那資本家準備用為追加資本或未到期的可變資本，通過了借貸關係的中介機關——銀行，而投資到公債上。假定在這個場合下，那末政府通過公債政策而獲取的經費，都是社會上的游離資本。自然，公債的發行數量愈多，則社會上的游離資本愈少，從而那可以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數量，首先就是那些不是商品界流通過程所必要的流通手段，即會給政府以公債為手段而吸收，因此，財政赤字既有了填補的辦法，政府當然用不着實施籌款底最後的手段——加速着印刷機的轉動而增發紙幣，即如已經發出的紙幣，亦可以發行公債而收回。這樣看來，公債的發行，如果只限於吸收社會上那些離開了生產領域的休閒資本的前提下，則該項公債是有對於通貨膨脹具有調節的作用。在戰時，由于支出之不可避免，紙幣發行常有增加的可能，假如我們在某一限度內，能夠利用公債而把增發的紙幣收回來，藉以中斷通貨膨脹的發展，如斯，則我們不能不稱它為一種支持戰爭的有力之方策。雖然由于公債也是有價證券之一種，它的持有者，可以把它向證券市場拋出，換取貨幣；但在公家信用還健全，公債的發行數量，還未超過國民所能節約的限度的場合下，不管公債在私人(或私人團體)間怎樣流轉，迄其迴歸至中央銀行，因此而需中央銀行發行紙幣，乃屬少數。同時，在公債發行還未過量時，它的利息是不會很高的，因而那由于公債利息的負擔，以致形成財政的龐大膨脹，也是很少的。

## (四) 促進通貨膨脹的惡化

——由量到質的突變——

伏羅希洛夫氏 (Voroshilov) 曾經這樣說過：『現代的戰爭，將來一定是持久的，綿延不決的消耗的戰爭』。這樣說法是很對的。伴隨着現代戰爭的「持久」，「綿延不決」，和大量「消耗」，那末戰時財政的膨脹，一定是很驚人的。但隨着戰爭的擴大和延續，租稅的徵課，成了很大的困難。假如在這種場合，還不運用公債政策，以彌補鉅大的赤字，就很容易地要走到印刷機的轉動了。這就造成了戰時公債膨脹的必然性。

公債膨脹愈大，公債的利息就有愈高的傾向，而公債的發行，也有從自由的勸募轉變為強制推銷的傾向。因此，不啻由于高利的引誘，或者受到強制的攤派，國民一定要力謀消費的減省，以節約所得，來承銷公債。公債膨脹的結果，政府所負的利息額愈多，財政的赤字愈加擴大，于是又把公債膨脹，推進到更高的一個階段。這樣更番地把公債膨脹下去，那末政府以公債所吸收進來的資本，則將不僅是在睡眠狀態中的休閒資本（主要的是小有產者的退藏資本和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游離資本），甚至即連活動資本，亦將部分地從生產行程中撤退出來。因為公債之自由的正常消化量，是以國民所能節約出來的資金總額為極限的，公債膨脹相等于國民所能節約的資金總額時，公債消化就達到了飽和點。超過了這一個飽和點，首先就壓迫到人民的生計，妨礙到人民的購買力，使人民生活向着較低的方向轉動；其次就成了再生產的桎梏，從而促成生產的衰落，物價的騰貴，跟着又促進了財政支出的龐大，和公債的膨脹。在公債消化已達到了飽和點之後，公債的發出，便很困難了。那末，政府只好以中央銀行為承銷的對象。而中央銀行也只有假手于印刷機而對政府供給大量的紙幣，這樣，信用的，匯兌的和紙幣的膨脹形態，都將連串地綜錯地發生起來，把整個的金融、財政、以至產業部門，都受到崩潰的威脅。此即是惡性通貨膨脹的開始。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支持掠奪性的侵華戰爭，財政歲出的膨脹與年俱增，歲入的來源，多仰賴於公債。日本一九四〇年的預算總額爲一百零三億六千萬日元，本年度發行的公債額，最少當在六十一萬三千五百萬元，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二一。那末從日本國民所得的二百五十億元（註六）來看，單是公債膨脹已佔了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點五四，連同其他國民對財政的負擔，那全部預算就佔了全部生產力二百五十億元的百分之四一點四四。試問日本人民，怎能餓着肚子，除了負擔重大的租稅之外，還將所得的差不多二成五拿來去消化公債呢？現在日本全國公債總額已達到二〇、八五九、三八一、〇〇〇日元，單是一九三九年度預定發行的，就達七十六萬二千九百萬元，但，國民儲蓄總額，經過前年（一九三八年）的大搜索，也不過由二十七萬萬日元增加到五十萬萬日元，就是全部撥充購債之用，都還不夠呢！所以，下面的一條電文，就充分地說明了日本公債底腸胃病：

「中央社東京八日路透電：大藏省本年度預定發行公債額，總計七十六萬二千九百萬元，蓋以國家收入五十九萬二千五百萬元，乃得平衡本年度之預算。本年度所發行之公債，迄十一月爲止，已達三十五萬零二百萬元，尙未發行者四十一萬二千五百萬元。」——民廿八年十二月九日雲南日報。

「公債倘使不能吸收民間儲蓄和市面游資，而只是由日本銀行一面承受，一面增發鈔票來繳付價款；則一旦等到鈔票發行額超過了經濟社會流通所必需，就是惡性膨脹的開始。所以，我們必須明白公債消化不良是惡性膨脹前期的特徵」。

## (五) 結語

在一定的限度內，即是不容超過國民所能節約的總額，而發行的公債，那的確是具有調節通貨膨脹的作用，並且是支持戰時財政的棟樑。只是在公債發行，突破了國民所能節約的總額，則公債對於金融的關係，始起由量而質的突變。因此，我們爲了支持龐大的抗戰經費

，也該在一定限量內，慎重而巧妙地運用公債政策。爲了擴大公債的消化量，我們擁護政府所倡導的節約儲蓄運動。

中國現在還是遺留在農業佔着產業底重要比重的階段，公債的最消化量，決不能和其他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樣，規定于銀行存款的總額，乃是寄托在廣大的農村上。敵人的飛機回然是不能毀滅它，敵人的砲火，也難毀滅它，此即是我國農村經濟對於戰費支持的優越性。自「七七」事變以來，我國中央政府所發的公債，計有六款：

債名	發行日期	債額	到期
救國公債	廿六，八，十六	五萬萬元	年四
國防公債	廿七，五，一	五萬萬元	年六
金公債	廿七，五，一	國金一萬萬單位	年五
		美金一千萬磅	年五
		美金五千萬元	年五

## 論法幣的健全性

### (一) 日本何以要破壞我國法幣

日本於我馬倭之際，爲何要破壞我法幣呢？其理由有三：

第一，現代戰爭，是全民戰，是經濟戰，經濟戰中，貨幣戰是其主力戰。因爲貨幣是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正如西塞羅（Cicero）說：「沒有一個聖潔的地方不爲貨幣所污穢；沒有一個金城湯池不爲貨幣的威力摧毀的。」所以要沮喪對方的戰意與士氣，莫若直接破壞對方的貨幣組織，使對方的貨幣崩潰，敵人從前對我新幣制之推行已不採取放任態度，到現在更看準這點，所以於軍事侵略之外，加速破壞我法幣，此其理由之一。

第二，我國經濟基礎之得以堅固，由於幣制之得以順利改革；幣制之得以順利改革，由於英美的援助，英美之所以援助我幣制的改革，一方面實想控制我國的貨幣權；他方面維護他們在華經濟的權益。所以日本爲想驅除英美在華的經濟勢力，壟斷我國市場，達到其獨霸

救國公債	廿七，七	三萬萬元	年六
建設公債	廿八，八，一	六萬萬元	年六
軍用公債	廿八，十，一	六萬萬元	年六

合計起來，也不過約二十八萬萬元，比起日本，超過了二百萬萬日元，真是小巫見大巫了。假如能夠配合着很好的政治動員，適當的分配，特別是要表現出強明的政治，使人民不再懷疑那些經費並不會落到貪官污吏的腰包裏，這自然是易于消化的。

最後，特別要指出：我們這次對日的抗戰，乃是爲了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這是一種自衛性，革命性的正義戰爭，我們爲了達成這種神聖的革命任務，當然要基於「有錢出錢」的原則，不惜任何的犧牲，忍受任何的痛苦，把承銷公債的責任肩負起來！

李作榮

東亞的野心，則不能不注力破壞我法幣。

第三，日本顧慮着他底人力物力財力之不繼以應付我所採取的長期消耗戰，於是巧用其無價值的軍用票來徵發我國豐富的物資，輸往外國，換得其缺乏的軍需回來。同時在我淪陷區發行「偽聯銀券」，驅逐並奪取我法幣，藉以套換我外匯，削弱我平準基金，以補救其日元的危機，這樣就可遂其樹立所謂日「滿」一「支」經濟集團，實現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夢想了。

總之，日本爲要滅亡中國，才窮思竭慮地來破壞我法幣，他們以爲我國所以能抗戰，其基礎便在乎法幣，無怪著名中國通的鈴木三榮公司常務理事土屋計左右很着急說：「國民政府（中國）之能維持抗戰，實由於一九三五年之幣制改革，及白銀國有令，國府以紙幣收買民間的白銀，達十餘萬萬元，運存海外以作今日抗戰之軍費，爲根柢這種抗戰的財源起見，必須破壞法幣。」

(二) 日本破壞我法幣的陰謀

在我國未施行幣制改革之前，日本早在搗亂了。如着令其在上海華北開設的銀行，拒絕將現銀移交中國銀行，同時唆使浪人拚命地在上海廈門廣州各處用高價收買白銀，私運出境，又積極地陰令華北當局統將白銀截留，不准南運，使我當局破格的設現銀準備分庫於天津濟南青島等地，這種陰謀的手段，無非在阻礙我新幣制的進行。

至我全面抗戰展開後，日本爲要打擊我國的抗戰力量，攫奪我外匯與資源及早遂其獨佔的幻夢起見，故對於淪陷區劃，加緊搜索現金，並限制我法幣流通，同時設立「偽蒙疆銀行」和「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紙幣。據「聯銀」公布的發行額，於去年六月底爲五九四六〇，〇〇〇元，十月初增至八八，八五〇，〇〇〇元，十二月底又增加至一四八，二二〇，〇〇〇元。這筆濫發無度，強迫淪陷區國民使用，其目的，盡想套換我法幣，致使我法幣外匯上有黑市場之出現，由對英兌率十二便士半降至八便士左右。跟着敵騎所到之處，大量推使軍用票，並通令以軍用票爲日本在華中華南各淪陷區的御用通貨，想藉此吸收我人民所生產的物資，以資軍用，或輸出國外，易取我外匯，同時盡把我海口封鎖，奪收關稅，計被日人暴力劫持之數，約在國幣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這種掠奪行爲，還覺不足以搖動我幣值，減低我抗戰力量，於是爲要徹底打擊法幣起見，不得不出其最辣的手段，如規定今年一月三日起至二月二十日止對華北地名的法幣，再貶價三折，即以六折行使，由三月十日起有完全停止流通的偽令，同時在華北積極統制出口外匯，實施外國匯兌基金制，貿易連鎖制等，希圖成立偽幣的對外價值。

日本雖不惜窮思竭慮地來破壞法幣，但法幣之穩固如常，而抗戰力量反日益堅，使敵人手足無措之下，爲之欷歔不止。於是檢討其過去之失敗，進而在華中再運用它底詭計，即於五月十六日設立所謂華興商業銀行。它底手段，也不外是發行無準備的偽鈔，套我外匯，惟不再規定和日金聯繫及等價授受，並可作購買外匯之用。查其最大用

意，則企圖實施統制以上海爲中心的財政制度，一方面謀徹底打擊我法幣，他方面冀排斥外人在華中的權益，以圖早日結束戰爭，建立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置我國爲其附庸，其手段之陰險，概可想見了。

(三) 匯價低下是法幣崩潰之徵兆嗎？

我國外匯，原以法幣一元可換英鎊一先令又二便士半爲法價。至去年三月十三日北平成立偽準備銀行，並發行偽鈔後，我中央政府爲防範敵人以偽鈔套換外匯起見，即於同年三月十四日執行限制外匯新辦法，凡商人具有正當需要而必須購買外匯者，得依外匯規則申請，經財政部核准後，轉知中央銀行才得購買。當時申請之數極多，而政府核給之數則不及申請之一半，續後核給之數雖少，外匯之需供不能相抵，外匯暗市，於以發生，法幣遂跌至八便士四分之一。同年八月會成立非正式的小額基金，維持公開市價。今月三月九日，我國中國交通兩銀行會同匯豐麥加利兩銀行，又成立一千萬鎊的外匯平準基金，以維持匯市。計由去年六月至今今年六月六日，將近整年，八便士四分之一的匯價，屹然不動。不料到了六月七日這天，我國法幣對英匯價價格，突由八便士二五跌爲七便士又四分之一。其後又跌至六便士又五三一。這次暗市匯率的變動，確實驚動不少人士的憂慮，很多中了幸災樂禍的日人所散布的謠言，就妄以爲中國的外匯基行將告竭，英國的援助或將停止，顧此而推定法幣行將崩潰，日本打擊法幣的陰謀也就全告成功了。

我們無論研究任何一個問題，應以冷靜的頭腦分析事實，不可祇知其現象而忽略其本質。例如這次暗市匯價之變動，一口誤認爲我外匯基金的枯竭，這就是犯了這個毛病。試以外匯平準基金設立之日起至這次（六月七日）匯價大變止，壽命行程僅過了兩個多月，其中不免爲着貿易入超與日偽的奪取而稍有消耗，姑舉日方惡意的推測，爲要維持八便士二五的水準所須動用的外匯，每月必須供給一百五十萬鎊。現根據這個數字估計，兩個月來所動用的基金，亦不過三百餘萬鎊，怎能說全部基金已告用罄？

再以爲英國行將對我停止援助，更屬淺見之至！我國這次幣制改革，若得不到英國的同情，是不能成事的。查列強在華投資的總額，約值三十二萬萬美元，英國即佔有其半。現日本對法幣加緊的破壞，無異摧毀英國在遠東的權益。英國不想維護其權益之受摧殘則罷。若要保持其在遠東的權益及地位計，對我法幣的支持，實爲自保應有的手段。倫敦新聞紀事報稱：「中國法幣的穩定，對於英國財政與商業利益，乃具有生存需要。」證之最近英日衝突之日趨尖銳化，英國決不走此自絕之路，實不待言！

由是這次匯率的變動，自然不是由於我外匯基金之用罄；也不是由於英國對我援助之停止，變動的主要原因，本校黃院長元彬說得很透澈，現引述如下：

「事實上，這一次的黑市匯價的低跌，很明顯的是基於對外貿易上的需求。由本年一月到三月，中國第一季對外貿易入超額達七千七百萬元。由一月到六月，則約達三億二千萬元。而且這些數目，還是以金單位照法定匯價來伸算的，如果照黑市匯價來換算，前者便達二億元，後者竟達十億元了。在這樣的巨額貿易入超中，除日圓集團負擔以偽幣購買的一部分不計外，大部分是以法幣購買，由我們負擔，即使西南後方出超甚巨，亦遠不及佔領區的收入，僅藉華僑匯款以彌補其一部分，我國設置之一千萬磅外匯基金，不能不日見短絀，爲了這樣，政府對於黑市匯價，便不能不暫時採取放任態度，而任其跌落到較爲適合於我國經濟水準的定點了。所以這一次的變動幾乎完全是入超激增的結果。」

「因爲在這期間，日人搜羅數百萬元的法幣，意圖向黑市場衝出，藉爲對英國維持法幣的一種威脅，使英國放棄其原來政策。所以這次的變動，多少是由於敵人的搗亂。」（見八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外匯黑市之長期穩定對策一文）

從上所述，可知這次匯價的變動，實由我國爲調整目前八便士二五的水準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同時要給日方查換我法幣底陰謀的一個

打擊，不得不自動把黑市匯價低跌，亦不失爲自衛最適當對策，

#### （四）日本破壞我法幣之失敗

日本破壞我法幣所用的手段，雖極其毒辣，但其結果，却是着着失敗的。例如軍用票，原想在其刺刀支持下，流通于華北佔領區，取法幣而自代的。但是這些軍用票得不到佔領區人民的信用，簡直成爲廢紙，結果苦了他們自己的商人。于是才想出「以華制華」的通貨政策，發行「偽聯券」，打算將在華北的法幣基礎破壞，其方法是用「偽聯券」套取華北的法幣，然後以法幣購買外匯。想不到作繭自縛。弄巧反拙。因「偽聯券」連繫于日元，等價授受，結果不特套不到我國的外匯基金，反使「偽聯券」成爲投機的工具，拖累着日圓會一度在上海價值的慘跌。因爲「偽聯券」原來也是毫無價值的廢紙，既無準備金，又不能直接購買外匯，故價值逐漸下落。現在每法幣百元就可買得「偽聯券」一百三十元。于是投機家乃得運用其「偷龍轉鳳」的手術，先以法幣買低價的「偽聯券」，然後以偽聯券平價換日圓，便得相當的利益。以後更將日元拋出上海高價出售，轉成法幣，又獲得相當的利益。反之，拿日元變成法幣後，更將所得的法幣在華北掉換偽聯券，亦可獲得利益，這樣兩頭轉套，均可獲利，於是日寇使人不成，反賠了老本！

日人飽受虧損後，鑒於法幣在華北信用，絲毫不顯動搖，遂用人爲的提高偽聯券底相對價值，是即兩次壓低法幣對偽聯券的比值，其壓低的程度，竟達百分之四十。但日本爲想再進一步急進推翻法幣而代以偽幣，遂聲明本年三月十日以後禁止法幣在華北流通，怎料到英國不先不後適於該日宣佈以五百萬磅協助我加強平準基金，使我法幣信用，益形堅固。敵僞在無可奈何中，乃將華北分兩區，一個是「準銀區」（偽聯合準備銀行區），他一個就名之爲「匪區」。在「準銀區」內絕對禁用法幣，豈知事實竟大謬不然。再度使敵人氣短，就是準銀區的法幣，依舊無法禁止使用，不得已於五月八日乃通令對於法幣不再限制和存儲。



所以敵僞爲壓迫我法幣，弄得手忙腳亂，舉棋不定，而其結果，却是勞而無功，弄巧成拙。

敵人既慘敗於華北，仍不肯懸崖勒馬，更求逞於華中，遂有華興銀行的出現。那知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成立後，不及四天，日元的跌價，在上海幾乎每日都有所聞，據上海路透電，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日元價格僅折合法幣九角二分三釐，二十三日僅合法幣八角九分五釐，暗盤最低竟有八角八分之市價。雖經敵駐滬當局極力搶救，日商銀行的竭力支持，結果仍跌至每元合法幣九角二分半，同時僞華興銀行紙

# 中大動態

## 中國工業建設問題座談會記錄

時間：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一時

地點：本校同德會

參加者：蕭冠英 鄧植儀 鄒卓然 漆琪生 周伯棟 楊開甲 姜家祥 王德立 史國綱 康辛元 關東伯 胡德元 蕭遠人

徐叔漁 黃元彬 黃剛 劉均衡 蕭雋英

主席：蕭冠英（以發言先後爲序）

蕭冠英：各位，今天得到各位來討論中國工業建設問題，兄弟感到非常的快慰和興奮！中國自同治初年，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曾國藩等開始提倡中國工業化以來，雖然不能說有許多的成績，但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經過不斷的奮鬥，已有相當的成就。

惟自此次聖神抗戰發生後，沿海工業，大部份皆受倭寇破壞，爲着抗戰建國之需要，對於『中國工業建設』，自然成爲當前最迫切的一個重要課題。兄弟是研究工業的，對於工業技術方面雖有點小

幣，據中央社香港二十六日電，以一百五十五元，始能換法幣百元。（參照經濟動員第三卷第四期中日貨幣戰的現階段一文）

由上所述，可見日本處心積慮要破壞我法幣，百計千方要排斥我法幣，而我法幣則精壯力強，健存如恆，曾不爲其所動搖，而仍得岸然存在於故土；這因爲我法幣固有國際性，內得人民的信仰，外得友邦的支持，而具有堅強不拔的氣質；那日元與僞鈔的低跌，實即反映敵人破壞法幣的慘敗。

黃元英  
程頌文  
鄭隆全 筆記

的貢獻，但是中國工業建設問題，乃與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具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關於中國工業建設的整個計劃，有待各位先生共同來探討。所以今天特請各位先生到這裏來，希望各位發表高見，賜予指導！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爲：中國工業建設問題，內容分九個問題來討論。第一、第二兩個問題最重要，而是屬於工業政策，否，屬於整個國民經濟政策的，其次，則多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較爲單純，現在先從第一題開始。

### 一、中國工業建設程序問題

(1) 先重農呢？抑重工呢？以及若何由農業經濟而發展爲工業經濟化？

(2) 先發展輕工業呢？抑發展重工業呢？

(3.) 先發展機械工業呢？抑先發展動力工業呢？

(4.) 先發展民生工業呢？抑先國防工業呢？

漆琪生：關於中國工業化問題，國內工業家經濟學家已有過熱烈的討論，記得民國四五年間，這問題已被提出，七年又被提出，廿四廿五年間大家又熱烈的討論起來，兄弟前也曾參加過討論，但是從前與現在的環境不同，以兄弟的意見也隨着改變了。中國自發動神聖的抗戰以來，事實告訴我們：配合着抗戰建國的需要，中國當前應該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建立穩固而強大的國防經濟，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國民經濟建設程序問題，自然是主張年重工的。但是中國國民經濟的礎石原是建立在農業經濟上面的，因此我們從事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就不能不注意到農業經濟的適當維護與改建，特別的應當着重於使農業經濟能夠配合工業需要而發展，工業建設成爲農業資本主義生產化之原動力，然則中國眼前要想從農業經濟的階段發展到工業化的領域，畢竟應該經歷若何的進程呢？我們可以舉出二個例子來參考，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它是由農業而工業化的國家，它所經過的方針，乃是首先建立大規模的動力工業與機械工業，而將此等動力工業與機械工業向着發展農業經濟方面去運用，盡量使農業發展成集體化，機械化。農業愈機械化與集體化則愈需要工業供給大量的動力與機械；工業愈發展，則愈能滿足農業機械化的要求，二者互爲輔助，形成不可分割的聯繫，於是成功了今日蘇聯的經濟的繁榮。另外一個則是第一次歐戰以後的新興國家土耳其，它也是由農業經濟國家而發展爲新興工業經濟的國家。它的方式，首先發展輕小工業，即先由毛織工業做起，再按次轉到重工業的建設去。因此土耳其的工業化，是帶着幾分半殖民地經濟的色彩，較之蘇聯工業化過程既不能充分完成，基礎實較不鞏固。依照這兩個例子，中國工業化究竟應仿倣何者爲宜？我的意見，認爲一方面從重工業的優越性而言，他方面從抗戰過程中國防重工業的必要性而言，是應該直接了當的採取蘇聯的辦法，而不應該仿倣土耳其去走先發展輕工業然後進而重工業的迂迴道路。所以中

國的工業化之程序，是應首先着重重工業的建設，藉此一方面可使農業機械化，另一方面可使國防工業化。至於在整個的工業建設程序中，當以發展軍需工業，動力工業，與機械工業爲第一位；機械工業爲第二位；一般的民生工業，則居末位。只有能像這樣的區別出輕重緩急的關係，分配人力，物力，資力去建設工業各部門，庶乎始能使中國國民經濟的機構，很快而暢通的從農業經濟之階段，進越到工業經濟的領域；同時當前抗戰的緊急需要也可充分滿足。自然，我之所謂着重重工業發展而放輕輕工業云者，僅是二者建設時的比重關係而已，並不是主張只要重工業，而完全廢去輕工業的意思，這是應申明的。

周伯楛：剛才漆先生的意見，兄弟很贊成，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蘇聯的所謂農業工業化，因爲蘇聯的農業經濟是以大農制度爲基礎，而且這是農業工業化的必需條件。但中國所有的是佃農和小農，要實行農業工業化必很困難。中國墾地與非墾地之比爲六與四，達到這目的，就非盡量開闢大農場不可，但這又是困難的工作呢。

漆琪生：對於周先生的意見，兄弟以爲有點說明的必要，周先生說，農業工業化須要大農經濟發展，才有可能這一點，在原則上兄弟完全同意，至於像中國這樣小農經濟的國家，它要大規模的農業工業化，也不是絕對的不可能；同時要使中國在和平程序中，改善小農制度，建立大農制度，亦有許多辦法。以前國內對這個問題已曾熱烈地討論過，我認爲中國實行大農制，有兩個辦法：(一)否定現存的土地制度；(二)推行農村合作社制度。關於第一項辦法此地可以不必討論，現只說第二項辦法，即在不否定現行的土地制度，而利用合作社運動的發展，以達到大農經濟體系的建立，亦有可能的，蘇聯的合作農場與集團農場，就是具有這個使命。過去軍委會湘鄂贛三省所推行的利用合作社的運動，其目的即在於此。我們知道由利用合作社的成功，不獨可以集合參加合作社的社員——中小農民，共同出資購買機械，改善生產，集體耕作；並且還可進一

步的集中土地，歸於社有，建立集團農場，這就是在和平程序中將小農經濟轉化爲大農經濟，而使農業機械化的最有效而最可能的辦法。在現階段的中國，要使小農經濟之大農制化，實際亦只有採取這個辦法，較爲妥當而繁雜。所以我以爲我國農業之機械化，是不成問題的。

蕭冠英：關於第一個問題，各位如無其他別的意見，則繼續討論第二個問題：

## 二 戰時中國工業建設政策問題

- (1.) 注重防軍需工業呢？抑民生工業呢？
- (2.) 中國工業建設應着重國營主義呢？抑民營主義呢？
- (3.) 工業建設之指導應採取統制政策呢？抑自由政策呢？
- (4.) 工業建設之配置，應採取集中政策呢？抑分散政策呢？
- (5.) 工業建設之規模，應採取大工業主義呢？抑小工業主義呢？
- (6.) 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都市大工業的聯繫之方策若何？
- (7.) 工業各部門調整之方策若何？

對於這個問題，兄弟首先提供下列的意見：第一、中國工業建設政策，對於各部門發展的比重關係，應以國防軍需工業爲主，民生工業爲副；第二、對於經營方針，各項重工業應以國營是主，其他，則宜官督民營；第三、對於管理的策略，主要工業都應採取統制政策管理，自由發展不能適應抗戰之需要；第四、工業配置的方針，主要工業以集中於適當地區爲宜，避免散漫分裂之弊，自然，在此時亦須顧及防空的安全，實行單位體的相當分散；第五、工業建設規模，應以大工業主義爲原則，小工業主義爲附屬；第六、工業的地域配合，必須以都市工業爲中樞，四鄉配合以都市大工業所需要之小手工業，以輔助其發展；第七、關於工業各部門的調整關係，則應建立重心的系統和制度，即是應以國防動力工業爲核心，重工業機械工業爲二重外圍，原料工業爲三重外圍，輕工業爲最

的外層外圍，分別輕重，形成體系，彼此連絡發展。此外，工業與農村副業的問題，我認爲二者有互相爲用，互相輔助的關係，極應提倡，在工業化運動中，我們必須獎勵農民，除耕種以外，利用農閒時間去做輕小手工業，最近日未也是這樣的，如製紙用之紙粕，由農民分做，工場去收。據最近金陵大學白克教授的調查，中國大多數農民，一年間平均有二百天以上是空閒的，我們應該利用這種農民空閒時間的勞力。上海南京廣州各大都市附近的農民，除做洋車夫的業餘工作外，很少有其他的工作可做，所以，我們應該想出許多方法來利用這些過剩而可貴的勞動力。如斯，則在工業化過程中，既可實現主要的重工業之建設，又可扶掖輕小工業之發展，同時更可幫助農民生計之改善，促進國民經濟全般之繁榮，一舉數利，事半功倍。

楊開甲：本席對於中國工業建設政策問題，認爲應該顧到各方面的聯繫，不應該把它們分割來看，而應由其種種關係來決定，譬如目前軍需工業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們的國際路線被切斷時，民生問題便要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民生工業也是很重要的。又如重工業應着國營主義，但輕工業及民間有能舉辦之重工業，政府應該獎勵民營工業的發展，而不應該阻礙其發展，所以民營主義，也應該着重才對。又如第三項中國建設之指導，應採取統制政策呢？抑自由政策？本席認爲各方面均不可忽視，各方面都是重要的。首先不應作原則上的決定，我們應該把工業分類，那種是屬於國營，那種是屬於民營，然後依據各方面的因素來決定，總括來說：第一步須先把工業詳細分類，然後才能夠討論原則上的問題，這樣才有意義的；第二步須研究工業的理論，然後才能夠談建設的步驟，這樣才不會有錯誤。

鄭卓然：關於這個問題，兄弟有如下的意見：

(1.) 注重國防軍需工業呢？抑民生工業呢？就目前戰時來講，應以軍需工業爲重，但就平時而論，則以民生工業爲重。戰時與平時是不同的。兄弟是學習化學原料工業的。我們知道第一次歐戰時，

德國平時供給工業製造之硫酸及蘇打(Soda)等原料，到了戰時即爲製造軍需工業之各種毒氣及炸藥等，故戰時的國防工業，到戰後應該馬上變作民生工業的。

- (2.) 國營與民營問題，在戰時當以國營爲主，民營爲副。
- (3.) 無論戰時或戰後，都應採取統制政策。
- (4.) 工業建設之配置，兄弟也主張集中政策。
- (5.) 工業建設之規模，應採取大規模工業爲主。
- (6.) 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都市大工業的聯繫，兄弟從前曾在廣州河南創辦大規模之織布廠，開始時與各小織布廠甚形隔閡，後來經過許多方式的聯絡，說明大小工業合作的意義，後來才能夠獲得良好的聯繫。由這個例子，也可看出大小工業應如何聯繫的了。
- (7.) 工業各部門調整之方案，自當以妨止托辣斯大組織的操縱爲最重要。對於輕小工業，政府應加保護與獎勵，使整個國民經濟能夠平衡發展爲原則。

姜家祥：兄弟對於工業建設政策也有幾點的意見；

- (1.) 關於剛才鄒先生對於戰時應該考慮到戰後的意見，這是非常同意的。戰時軍需工業是最重要的，但民生工業也是很要緊，這就是說；在戰時的工業建設應考慮到平時的工業建設。這才是辦法。
- (2.) 中國在戰時或平時，都應採取國營主義。尤其重工業與動力工業需要很大的資本，民間資本有限必辦不到，故實非國營不可。但民間做得到的輕重工業，自應由民營，但應實行統制政策。
- (3.) 統制政策是應該的，合理的，無論戰時，或平時都需要，因爲如果沒有實行統制政策，則有利可圖者，大家爭着來做，而社會急需者，反沒有人舉辦，結果對於整個國家民族是很不利的。
- (4.) 工業建設在平時，當應採取集中政策，以便宜管理，但在戰時，應採取分散政策爲宜，使不易受敵機轟炸，致影響戰時工業之發展，但要考慮到戰後可能集中的問題。
- (5.) 工業建設之規模，應採取大工業主義。但是大工廠的建立周

圍的小工業自然隨着發展的。像美國福特汽車廠附近鄉村便有許多小工廠跟着建立着。

(6.) 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都市大工業的聯繫，可利用工業合作社的方式，使大小工業發生密切的關係。

王德立：關於這個問題，兄弟也有點意見。兄弟最近才離開兵工廠對於國防軍需工業所遇見的困難，頗知道一些。所謂軍需工業，最要的是指製造飛機槍炮子彈而言。現在國內軍需工業發生的困難是材料的缺乏，國內國營的軍需工廠，因爲缺乏材料而不得已停工的爲數不少。我們知道：兵工廠需要的材料很多才夠，現在國內所能供給的很少。國內鋼鐵產 每月僅二三百噸，生鐵產量每月亦僅一千噸左右而已，但戰時軍需工業所需要的材料數量很大，區區數量怎能供給戰時大量的需求呢！所以兄弟對於軍需工業固然主張由國家經營，但要知道國營的發展是要民營來協助。政府爲着抗戰的需要，應多多獎勵民營事業，民間因求實利故必集資經營，所製產品可由國家收買，這樣才能盡量充分地發展軍需工業。又因爲國內的運輸困難，現在僅存的滇越路，能夠運輸的數量也有限，故對於交通事業的發展也是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又在經濟的立場上說：中國目前應該盡量生產特殊的產品，在農業方面，也應該盡量出產中國特產，如茶，桐油，絲，棉等特產品。礦業方面也要盡量開發寶藏，配合着軍需的需要，實行統制政策，獎勵民營工業，以我們出產的特產品，去換取外匯及材料，作爲發展戰時軍需工業之急需條件。

鄒植儀：兄弟是學習農科的，對於工業是個門外漢，但是兄弟對於工業很留心。兄弟有一個問題，很久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什麼問題呢？就是究竟中國要建立初步的國防計劃的雛形，所需要的基金，包括設備，材料，及維持費等，最低限度要多少呢？這裏所謂「雛形」的意思，乃指空軍第一道防線要維持五百架飛機的戰鬥力和轟炸力。至於海軍自然談不到。陸軍方面也要保持現代國家應有的戰鬥力的意思。如果我們能夠解答這個問題，則我們便可統籌

和募集這筆鉅款建立中國的初步國防。希望各位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史國綱：兄弟記得前幾個月有個朋友寫信給我，告訴他有個在某機械廠任職的朋友告訴他說，某個國營的機械廠花了八千萬塊錢的鉅資，購買了大批的機器，但後來缺少另一種的材料，致全部機器不能適用，如果要應用的話，還需要花了許多時間和金錢才能夠做到。由於這事實的告訴我們，當前工業建設問題，要注意下面的三個基本條件；

(一)要合理的……工業建設要配合整個國家的需要。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合理的計劃。上面的例子就是證明不合理的原故。

(二)要有計劃的……上面的例子也證實沒有計劃，結果終歸失敗，中國工業建設應該有整個的計劃。配合着工業各部門的需要，才不會白花時間與金錢，結果一無所成的。

(三)要經濟的……抗戰時期國庫必是感到困難，第二次歐戰發生後的今日，外資的來源也受很大的影響，今後中國要順利建設新工業，對於經濟問題，更應該特別注意。

上面三個基本原則，是中國工業建設的最重要條件，未知各位工業家以為然否？

康辛元：關於第一項，兄弟認為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是一體的。戰時是國防工業，平時就是民生工業，例如硝酸在戰時是軍需工業的必需品，在平時即可作為製造肥料。所以軍需與民生是合一的，也可以說是一元的。關於第二項國營與民營問題，兄弟也主張應着重國營主義，但應協助民營工業之發展為原則，並要實行統制政策。至於配置應集中或分散，應與原料出產地接近為原則。例如資源委員會在湖南開採鐵礦，所以有許多機械廠便集中在那裏。至於規模自應以大工業為主，小工業幫助大工業的發展為原則。又對於大小工業的聯繫問題，應取密切的連絡，不能分別而論，要知大工業是重要，小工業對於國防工業也有很大的貢獻的。

關東伯：兄弟對於中國工業問題，也有幾句話要說：中國以前是實行重農政策的，但這正是帝王時代的愚民政策，農業固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沒有工業輔助其發展，則農業實沒有法子可以發達，現代工業化國家農業之發展，不是農民而是由於工人。農業要發展之途徑，固然要先發展大農制，但是有了大農場之後，那便非實行工業化不可了。今日中國為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自當注重國防重工業的建設，要建設重工業，就需要原料，要採取原料，就需要開礦山，要開掘礦山，就需要動力之推動與乎交通之運輸。這些都要有整個的計劃，有了整個的計劃，由國家統籌大資本，故大規模工業應由國營，至於工業建設之配置，由於容易管由分配，又應該集中。這許多問題都是聯繫着的，都是工業建設的重要問題。

蕭冠英：關於中國工業建設政策問題，剛才已得到各位發表不少的偉論，現在繼續討論第三個問題：

### (三)戰時中國工業建設機構問題

(一)中國工業各部門應採取若何組織，若何式樣，與若何單位？

(二)中國工業各部門設置區域應若何分佈？以及彼此之間若何連絡？

兄弟對於這個問題，有下列的意見，現在先提供出來：

(一)國防重工業之組織，以國營大工業為主，並力求集中化與合理化，因此其樣式應着重於高度的分業化，與綜合而精密的一元化。

(二)工業區域的分佈，應依下面幾個原則：(a)力求生產地區與消費地區接近，(b)力求原料地區與製作地區接近，(c)力避不必要地方的濫設工場，(d)力求國防重工業設置於後方安全地帶。

胡德元：戰時中國工業建設機構問題，應先考慮到原料的問題，剛才王德立先生說過，中國工業建設最困難是缺乏材料，所以關於工業各部門之組織，應考慮原料的來源，例如四川兵工廠需要大量的鐵，國家既未能開採，故應該獎勵民營為宜，以供戰時軍需工業之需。

。又如糧食工業之分配應依需要地區為原則，關於工廠建築應以經濟為條件。至於工廠地區應接近生產地或接近交通線呢？各種工業應分別來論：例如土敏土製造廠，則應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不應該建設在生產地附近。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國內兵工廠以前也患了大毛病，以前河南兵工廠僅製造大炮不製造子彈，而有的專製造子彈不製造槍炮。他們的目的，據說是為避免國內戰爭，即所謂裁兵良策云者，實是大錯而特錯，這種謬論在今日已不擊自破了。民國初年袁世凱主政時，建設國營鍊鋼廠，也因為組織機構的不良，結果停辦，勞民傷財，殊深痛恨。所以今後工商建設何者應舉辦，何時應舉辦，應作周詳的整個的工業計劃，用最經濟的方法精密地進行建設才好。

蕭冠英：現在繼續第四問題，這是較為簡單點的問題：

#### (四) 中國工業建設技術問題

- (一) 中國工業建設各部門所需要之模型機械應如何構入與製造？
- (二) 各部門之專門技術人材應如何僱聘與訓練？
- (三) 外國技術師應如何僱聘與待遇？

對於此問題，兄弟的意見如次：

- (一) 對於各部門所需要之模型機械，自應以高價購入，或用其他方法得之，同時在本國之內，亦極力獎勵新機器之發明。
- (二) 專門技術人材，政府應以豐富薪金優待，並加以名譽褒獎與政治訓練，以啓發其服務求精之熱忱。例如蘇聯的史泰哈諾夫運動，與意大利的鐵十字獎章，中共的紅板獎狀等是。
- (三) 對於外籍技術師的僱聘，必須注重僱聘我們友邦的技術師，待遇方面自當從優，但在可能範圍內，亦力事政治與習尚的同化工作，使其對我國發生好感，自然能竭誠助我建設，蘇聯在此點上，特別注意，我國亦宜仿效。

蕭冠英：關於中國工業建設技術問題，本席有點意見如下：

- (一) 對於各部門所需要之模型機械，除用高價購入及其他方法以

外，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培植技術人材，設立專門研究的機關，例如研究所，調查所等是。

- (二) 關於技術人材，高級幹部自然由大學培養出來，中級幹部也可由職業學校訓練，但是大學職業學校訓練出來的技術人員往往比在工廠服務多年的工人，才幹還要不及，所以工廠應該設立訓練班，負責培植大批技術人材，以應目前之急需，關於技術師之培養，應從三方面努力：(a) 由工廠直接訓練 (b) 培養實際工作的工程師，(c) 設立研究學術機關，培養學者。

- (三) 關於僱用外籍技術師，要選擇優良的工程師，中國以前所聘請的外籍技術師，往往是外國的劣等技術師，這是很重要的。

徐叔漁：關於第四個問題，鄙人是這樣的：

- (一) 鄙人認為中國在仿造外國機械方面，已有相當之技術基礎，在抗戰前，上海各範圍很小之機器工廠，已能自造內燃引擎與夫紡織機械等等，其出品在外表方面，未必劣於舶來品，而其問題即在凡非書本 (Text Book) 所載者，而發生之問題無可研究改進之機關，以此之故，因循敷衍，終難求其進步，譬如內燃機弓軸 (Crank Pin) 於使用若干時日後忽然中斷，及輪船後部推動器 (Propeller) 之中斷而發生危險，凡此問題，初非由於設計方面，實由於缺乏研究之故，若就上述兩例而言，其由於設計原理與材料強弱，未能配合應用而致之也，根據以上所見，鄙人認定有組織設立一中心完備之技術研究之機關，除希望社會上有錢人投資創立工廠外，更希望各資本家工業家能拿出一批經費來設立這樣一個技術改進之機關，但在組織方面鄙人意見除僱用少數管理技術人員外，主採用名譽志願性質之研究員，凡大學教師與工廠之工程師，皆可被聘為名譽研究員，如有發現成功，則定獎勵之章，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達學術公開之旨。
- (二) 關於技術人材之僱聘訓練問題，可說為我工業界中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夫僱聘之理想原則，自當歸納於「人盡其材」之說，但以中國之僱聘制度習慣而言，其云「人盡其材」之理想目的殊遙，

欲達此理想之雇聘原則，祇有採施開放自擇之主義，即由各受過技術訓練之人員，擇其所長所喜近之事以自荐耳，關於訓練方面，據鄙人所知上海各外人經濟之工廠，其訓練中國技術人員，反較中國人自辦之工廠為切實認真，凡初自學校出來者，須經過兩至三年之訓練過程，凡工廠內各部門，皆須一一經驗之，然後由廠方擇其所長，或服務成績最佳之部門而任命其職務，此種辦法，在我國自辦工廠，有採施之必要，以達「人盡其材」之理想目的，實現這雇聘制度與訓練辦法，則有待於主持教育之當局出而與社會聯絡提倡與發動之焉。

鄒卓然：關於各部門所需要之模型機械，固然是用錢去採購，但是我國以前向外國所購入之機器，往往是外國應用過的舊機器，外表重行油新，便運到中國來發售，購買的人不用說是上了大當，兄弟從前在廣州曾辦過染布工廠，關於染布機器的染色是德國發明的，我們曾經買過一架染布機器，在廣州河南廠做造，初時的成績很壞，但總考究不出牠的不好原因。我有一個姪兒在工廠做工，並沒有受過怎樣高深的工程學識，但他首先發現那副機器不好的原因，乃是這件作用與變化作用的關係，因為機器洩漏空氣的影響所致。我們發現牠的弊病以後，另行試驗，結果確得到很好的士林染色成績，由於這個例子，兄弟主張工廠應用人材不能單從他們的教育程度做標準。應該顧慮到他們的經驗和研究的精神才好。至於雇聘外國的技師和採購外國的機器，也應小心考慮，否則容易受騙。

蕭冠英：現在開始討論第五問題

### （五）中國工業建設資金問題

- （一）工廠建設資金應以國家資本為主呢？抑以民間資金為主呢？以及二者籌募之方法若何？
- （二）實業界與金融界之協作和融通之策若何？
- （三）外資利用之方式與範圍若何？
- 兄弟對於第一項的意見：認為重工業之發展必須由大規模之國家資

本以創辦之，惟其他小工業則可由民間私人資本辦理。至於國家資本募集方法，除推行建設公債與法幣政策外，並可以特別法令，規定銀行存款之投資。民間資本募集，則以股份公司為宜。關於第二項；則政府應極力鼓勵金融界的資金，向產業界流注，嚴禁其利用游資從事投機活動，則金融與產業自然融和。至於第三項：兄弟認為外資的利用，應以不妨礙主權與戰時建設為原則。至於應用範圍，力避用於軍需工業與動力工業方面，應以一般重工業為善，關於利用外資問題，讓研究經濟的諸教授發表意見。

黃元彬：關於利用外資問題，我的意見很簡單；

（一）工業建設資金應以國家資本為主呢？抑以民間資本為主呢？應根據輕重工業而論，即是說：國防工業及重工業應利用國家資金。輕小工業與民生工業則以民間私人資本為宜。

（二）實業界與金融界之協作，這是目前重要問題，金融界對實業界應以低利長期貸款為原則。

（三）關於外資利用之方式，中央政治會議，已曾規定三個方式，大概目前仍應依規定辦理。利用外資成功的國家，近的如蘇聯，遠的如美國。但南美許多小國，則因為利用外資不適當，受外資的束縛，這是失敗的例子。我國以前也利用外資不適當，致國家經濟基礎大受影響，此後我們應該特別注意。

楊開甲：關於利用外資問題，兄弟以為一般的原則在中國很不適用，例如所謂按平等互惠的條件。在抗戰以前，日本曾組織華北考察團到中國來，提出「華北經濟合作」的要求，並說要以「等互惠的條件進行談判。但是日本人的「勾當」並不是這樣單單的，日本是要攫取我華北的資資與材料，進而達到奪取我主權的陰謀而已！至於工業建設資金何者由國家資本，何者由民間資本，實不能作原則上之決定，要視國家的財力和民間的財力如何？國營與民營的分配又如何，按照每個實際情形來決定才對！

鄒卓然：關於資金問題，兄弟過去辦過工廠，頗得點經驗，現在可提供出下面的意見：

(一) 國防重工業以國家資本經營為主，但國家經營也應盡量利用民間資本，像廣州市省士敏土廠就是利用民間資本經營的。至於輕小之民生工業，則以民營為主，但若民間資本不能舉辦時，政府應該設法協助並獎勵之。

(二) 實業界與金融界之合作，應由政府適當指導。否則易為私人操縱，實得其反，兄弟從前在上海籌集七十二萬的鉅資，創辦工廠，當時已先決定由寧波幫及廣東幫各籌一半，但後來籌不足額，擬向銀行界貸款，不，幸得很！當時銀行界不但不幫助，反乘機勒取高利貸。所以，實業界與金融界之合作應由政府指導。

(三) 國營工業之資本，在不妨礙國家主權的原則下，盡可利用外資，但私人經營，最好不用外資為妙。

蕭冠英：第六個問題是；

### (六) 中國工業建設資源問題

(一) 中國工業各部門所需要之原料應若何生產與開發？

(二) 各種原料應若何運儲與分配？

關於這個問題，兄弟的意見是；

(一) 重工業之資源開發，可採用提倡開礦，補助獎金，保護礦權等方法以開發之。至於輕工業原料，則發展農業。

(二) 各種原料開發後，則須發展交通運輸，以便供給，並設倉庫，以資儲藏。最好建立運輸網與倉庫站等運輸制度。蘇聯儲藏石油與小麥即是如此。我國在此抗戰時間中，運輸孔急，更是應該妥籌運輸制度之完善，促進工業建設之成功。

蕭冠英：各位對於第六個問題既沒有什麼意見，則繼續討論第七個問題：

### (七) 中國工業建設與市場問題

(一) 國內市場應若何維持，國外市場應若何開拓？

(二) 市場價格應如何維持與調整？

(三) 運銷組織應如何建立？

兄弟對於第一個問題的意見：首先關於國內市場之維持，認為應該從下面四項着手：(a) 提高農民大眾之收入；(b) 獎勵國貨之使用；(c) 輕減國貨的捐稅；(d) 加重外貨的關稅等。其次，對於國外市場之開拓，以為必須採取下列三個主要辦法：(a) 獎勵輸出；(b) 輸出津貼；(c) 貶低外匯等。

第二，市場價格的問題，對內價格，則應力求低廉，尤須注重平均穩定而不變。對外價格，則着重屯併價格，貶低市價，以廣銷路。第三，運銷組織，在城市則宜提倡大規模的連鎖商店與百貨商品，在鄉村則宜發展運銷與消費合作社。

黃元彬：關於市場問題，國內市場過去競爭得最劇烈的要算與日的衝突，日本知道我國民族工業之發展，將為日貨市場之致命傷。所以盡量設法摧殘我民族工業，無所不用其極！國外市場的開拓比國內還要困難，但南洋方面還較為容易點，因為華僑對祖國的愛護與抱熱忱，華僑都知購買國貨。但還要與日本競爭。此外對於美國的銷路也不錯，但應着重家庭工業方面之發展。至於市場價格自應以廉物美為原則。關於運銷方面應組織交易所或國際貿易公司等。

蕭冠英：現在繼續討論第八個問題：

### (八) 中國工業建設與勞資問題

(一) 工業建設過程中如何吸收過剩人口？

(二) 工業建設應若何訓練工人與組織工人？

(三) 工人待遇與工資標準應若何？

(四) 勞資紛糾應若何調解？

兄弟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下：

(一) 以農業工業化，移民邊邊與開發資源之方法，吸收過剩人口。

(二) 設置專門機關與初級職業學校，訓練技術工人，更以健全的企業別的工會組織之方法組織之。



## 中山公論

(三)工人待遇，除在法律上予以保障，政治上予以獎勵外，工資須與增加其標準，應採實際工資制，即生活標準制，廢除名目工資制。

(四)勞資糾紛，當前調解之前提，以維護抗戰為標準，力事互助協調。

史國綱：歐西各國自大規模發展工業化以後，由小資本化變為大資本化，大資本集中在資本家的手裏，勞動者則窮得要命，結果釀成不可避免的衝突，使社會發生很不安定的狀態。我希望我國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不要再步歐西的後塵。

關東伯：關於工人的待遇，除非沒有資本家，有了資本家，工人的待遇總是不會好的，只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他們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本着這個原則，無論誰只要盡他的力量，便應得到生活的滿足，所以，他們的工人與廠長都是同等的待遇。蘇聯是這樣的，但我國是辦不到的。我國過去對工人工資問題，也曾實行生活標準制，但也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有人提議以米價為準則，也很難正確。總之，這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蕭冠英：現在討論最後的一個問題：

### (九)戰後工業復興問題

(一)戰區工業戰後應若何復興？

(二)戰後各地工業與各種工業應若何調整？

(三)復興資金應若何籌措？

兄弟對於戰後工業復興問題，有二點的意見：

(一)復興戰區工業，應以後方既遷定之工業各部門停留後方，不再遷回，從新建設為原則，因此復興條件，一切均從新着手，屆時政府應從新籌募大規模之恢復資金，訓練大批人才，以從事之，政府盡可能範圍內，充分利用外資以恢復戰區工業。

(二)戰區所恢復之各部工業，應着重即時地之需要，不宜與後方各部門衝突，尤須互相協助，後方有者戰區則停止之，無者始興辦之，不足者補充之。

鄧植儀：抗戰建國是我們當前的總目標，工業建設是抗建設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份，但工業建設最重的是要資本。資本固可由發行公債，利用外資種種方法籌集，但兄弟還有一點辦法貢獻；中國現在仍是農業國家，如果能夠使農業工業化盡量發展，農業品大量生產，則可將農產品換取外匯，增加對外貿易，例如國產茶，桐油，棉花，目前輸出已相當豐富，如果工業能夠順利地扶助它的發展，則這筆收入自然可以增加到很大的數目。我們便可以將這筆鉅款去換取外國的機器，工業建設也就有辦法了。兄弟前頭所發出的問題，究竟國防建設最低限度所需資金多少？就是想從農業與工業的合作中，尋求解答。但這個答案的實現，則有待於我們全國人士的共同努力。

蕭冠英：今天得到各位教授聚集一堂，發表出許多工業建設的卓見偉論，兄弟是異常欣幸，謹致謝忱，權作結束。(完)

——閉會——

# 本刊

優待讀者

擴大徵求定戶

本刊係本「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國策，竭盡棉力為大後方文化界服務，創刊以來，銷數日增，茲為酬答讀者愛護起見，特定優待定戶辦法於后：

- 一、定閱本刊全年計二十四冊，本埠祇收國幣貳元，外埠連郵國幣貳元貳角。
- 二、定閱本刊半年計十二冊，本埠祇收國幣壹元壹角，外埠連郵國幣壹元貳角。
- 三、定閱本刊全年或半年者，特大號不另增價。
- 四、定閱本刊外埠五分以下郵票通用。
- 五、優待期間自民國二十九年元月起至四月底止，外埠以郵局戳印為憑。
- 六、本刊定閱處：雲南激江本刊出版委員會發行部或昆明市華山南路生活書店。

## 本刊徵稿簡章

- (1)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來稿件。
- (2) 文稿不拘文言白話，惟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3) 文稿須適合現實，詞簡意深者，其字數每篇不逾三千字者為限，特約者例外。
- (4) 來稿請註明投稿者姓名，詳細地址，以便通信，稿件署名，聽投稿人自便。
- (5) 凡屬譯稿，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寄來，則請詳註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點。
- (6) 來稿登載後，酌致薄酬，或贈本刊。
- (7)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並附有郵資者，不在此例。
- (8)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9) 來稿請寄雲南省激江縣城內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收。

## 中山公論

每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雲南激江縣城  
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鄧孝慈

發行所

雲南激江縣城  
昆明武成路  
上海各書局

分售處

昆明武成路  
昆明各書局

印刷者

崇文印刷書館  
零售國幣一角  
訂閱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本刊已依法呈請主管機關在登記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特售國幣二角)